

BLOOMING
VIOLA PHILIPPICA

The Oral History
of Demotic Workers

怒放 的 地丁花

家 政 工 口 述 史

高欣◎编著



怒放
的

地丁花



家 政 工 口 述 史

BLOOMING
VIOLA PHILIPPICA
The Oral History
of Demotic Workers

高欣
◎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 / 高欣编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5

ISBN 978-7-5097-8918-6

I. ①怒… II. ①高… III. ①女性—家政服务—服务人员—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K8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6911号

怒放的地丁花

——家政工口述史

编 著 / 高 欣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谢蕊芬 任晓霞

责任编辑 / 任晓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010）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1.25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 /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918-6

定 价 / 4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I

有什么色彩的天空就有什么样的湖水。站在洱海边读高欣的《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我想起了自从舅舅去世后，北漂从事家政工作的舅母。

活着不容易是大多数家政工人的切肤之感。谁能帮帮“想爬起来，又被一棍子打倒”的刘红梅？王月娥需要照顾4位老人，她背负的是一座生活泰山。“为了儿女”是多数苦难的家政大姐活下去的理由。山东大涧沟村走出来的林凤刻画了中国千千万万个从农民转变为家政工人的形象。家政工这个群体虽然弱小，但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村的难题。刘亚红“能干就干，至于干多久，我也不知道”的无奈是多少家政工人的内心写照。

“不愿成枣花”是中国特定时期偏远农村妇女抗争的深深呐喊。刘清菊在乡下所处的困境恰如我那些年在乡下任教时的处境。从1990年每月45元工资到1997年我离开时每月280元工资的变化，彰显的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而是那时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工资最高的1997年，我每月在食堂吃饭也需150元左右。一年到头来我的工资所剩无几。为了到重庆参加研究生复试，我羞涩地向多人求助后才借到50元路费。那时中国乡村的绝大多数农民和

底层教师一年到头无发展自身之经济本钱，无赡养老人之经济能力，无抚养孩子成长之经济实力。对于女人来说，找个“城里人嫁了”，甚至找个“城边上的开三轮车的人嫁了”都是她们的选择。“在家就是等死”是那时大多数底层人的绝命符。

家政工作是一门内含心理学知识的艺术性工作。梁芸与张教授如同父女般的情谊在于梁芸的交往艺术，了解雇主和被照护对象的心理是梁芸做好家政工的钥匙。不过，王月娥的经历折射出中国时下雇主和家政工人彼此的心理距离感。信用缺失是我们这个社会交往成本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但是，社会中的个体往往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不良的社会心态。王月娥有唱戏剧的爱好，其所照护的老人心情开朗；刘玉红因懂英语而和雇主家建立了持久的感情。尽管没有文化是高青大姐的遗憾，但她拥有我们这个社会最为宝贵的财富——诚信，于是她从家政服务员成为家政公司老板。

家政工人应该有尊严。家政工作的体面性需要家政工人自己书写。即使“赢了官司输了钱”，家政工人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梁芸“你叫我跳楼也跳楼吗”的反问或许就是自我尊严意识的潜在体现。刘玉红领悟到“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道理，她的英语基础为她谋得了一份好工作，而梁芸之“以心换心”的认知则是她同雇主相处融洽的法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几千年来一直教导着的中国人。高青大姐在不知不觉中运用了中国哲学理论指导自己平凡的家政工作。而刘玉红那种“丢自己的脸，丢中国人的脸”的责任感，又是何等的高尚！平凡的刘玉红因此显得特别伟大。

尊严需要有丰富的权利内涵。这是一个为权利呐喊的时代。而权利本身需要权利者自身去认知并用行动加以捍卫。安翠萍、韩玉芳“宁愿这活儿不干了，也要先保护好自己”的权利意识大写了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真正内涵。对于权利的挚爱是社会群体得以被尊敬的前提，也是家政工获得雇主尊重的最好触发器。显然，家政工的体面性社会认知需要家政工人自身认同。只有这个群体自身认同了，社会才能认同。

刘亚红的艰辛也许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无法体会的。她的无助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可以将一缕缕阳光送到被人们忽视、政府缺位的角落，让刘亚红多少对生活有个盼头。历史表明，群体的尊严往往依赖于该群体的凝聚力。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参与特定组织的重要性。无论是北京的地丁花剧社，还是西安的家政工工会，抑或是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社，均是当下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生力量。“我碰到难处了，大家就一起帮我”，韩玉芳的话显示了组织的重要性。王葳大姐通过多年努力将工会办成家政姐妹们的家，为家政工人撑起了一片天空。在这个家里，每一位受苦受难的家政工人都绘出她们人生的一片云彩。然而，由于无法像企业工会那样有较充足的会费作为组织经费，西安家政工工会在缺乏资源之下到底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人在遇到大难时，才能很清晰地去感触周围的一切”，梁芸对人生的解读诠释着我们人生存在诸多不如意。人这一辈子，需要阳光，需要彼此的尊重，需要在困苦时的那句“丫头啊，你别哭了，如果你想孩子，你就把孩子弄来”的安慰。

但恰如刘清菊所认知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了解社会，知道自己的位置”则更为重要。平凡的刘清菊因此不再普通。这一哲理不会因人的阶级、阶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人对自己的认知过程有时缓慢，有时竟然那么长。从2007年到2014年，张惠兰用了七年的时间才首次讲出自己到北京后的第一份家政工作。然而，一旦跨出第一步，那份自信就意味着一个新的个体以及个体新的人生的开始。这也是一种社会哲学。作为大城市的陌生人，如张惠兰那样的群体还没有职业化意识，但还没有生长在职业化环境中的劳动者却在不断地改变这个社会，同时改变自己的人生。

经历多少困苦才可以涅槃重生？五百年的轮回不易。“唐僧有九九八十一难，我这也该好了”，李雪华在苦难中的期待和自我安慰也许是社会中最坚毅性格的写照。这恰如我作为乡镇中学教师那时的心理一样。这一群体的创伤性记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一部分。曾经的幼稚、年轻、虚弱不见了，年长、睿智、勇敢呈现新一代的家政工人面貌。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众多的关于家政工的政策使关注的目光投射到了家政工人身上，他们昔日“站在街边数汽车”的群体模样早已变了样。

当中国的“银发浪潮”扑面而来后，众多国民是否能安享晚年？高青大姐服务的雇主给她的那种“比他闺女都强”的评价表明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局限性。因养老保险太贵，林凤放弃了自己的未来。对于不看好自己儿子的林凤而言，对自己年老后的担忧是否意味着子女养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渐行渐远。刘红梅有一个懂事的儿子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生活再艰难，也应有光亮。学习古筝的刘清菊的巨大变化折射出现代家政工人的春天形象。这一形象已被国际劳工组织《家政工人权利保护公约》的相关条文定位。山东的高青大姐那种“要努力学习，摸索和积累经验”的认识并不是每个家政工人都能达到的。张凤兰的成长观是自我认知的体现。“走出来，就是成长”，这是人生成长的哲学。这一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的要求，甚至超越了许多社会精英。

“一个公司怎样对待员工，应该有个标准；可成千上万个家庭需要的家政工，却没有一个给他们规定和标准的条例。”张凤兰的话揭示了当下中国家政行业法治缺位的弊端。2009年12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安徽大厦召开的家政工人国际研讨会，来自陕西的家政工韩淑君说：“期待在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政府能制定出维护家政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五年过去了，韩淑君的期待仍在路上。在北京做家政的舅母现在还好吗？懂英语的刘玉红想出国的愿望一定能实现吧？

胡大武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

重庆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委员

国际劳动法学者研究联盟（LLRN）会员，

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5年8月于重庆

序言 II

非常荣幸被邀请撰写这本家政工口述史的序言，让我有机会在出版前细阅这些家政大姐的故事，从她们的经历、生活点滴中，更多地了解这个群体，体会她们从生活历练中散发出的智慧。

我与家政工的接触，有个人家庭层面的共同起居，有在乐施会工作层面的交流、同行。

初次贴身与家政工相处，是二十年前开始的。那时，我在香港生活（后来经常在国内出差），丈夫和我都有全职工作，女儿出生后，对小孩的照顾让我们必须考虑找一个家政工来帮忙。在香港，留宿的家政工都是从东南亚国家远道过来的，被称为“外佣”。十多年来，先后帮我家忙的有两名女工，一个来自菲律宾，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她们多年与我们共同生活。直至女儿长大念初中时，可以自我照顾后，我们才不再聘请留宿女工，改为聘请香港本地钟点家政工，每周来几个小时，帮忙做家务等。

家政工帮助了很多家庭，使他们的生活整洁有序，孩子和老人得到照顾，成人（尤其是妇女）可以安心外出工作。这个行业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非常大。不过，这些付出和价值，往往不一定被人留意到，更甚少得到嘉许。

谈到在乐施会工作中与家政工的交流，得先介绍乐施会。乐施会是一家国际扶贫发展机构，致力于消除贫困。它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贫困人群合作，一起努力解决贫困问题，并让贫困弱势人群得到尊重和关怀。乐施会在香港注册，在国内设有多个项目团队，推动扶贫发展工作近三十年。

早年我加入乐施会工作时，负责乐施会在香港的发展项目，其中多个项目是支持外佣组成的自组织。外佣每周只有一天休假（亦有部分雇主违反法规没有提供每周一天的假期），外佣自组织的骨干利用这一天珍贵的休息日，筹办其互助组织的活动，关心来到异地的姐妹们，组织姐妹共同争取劳动权益。我很是赞赏这些骨干的付出。

接手乐施会的国内项目工作后，我发现国内的家政工，与世界各地从事家政工的姐妹们，面临相同的困扰：行业不受尊重、工资低、工时长、劳动法规保障少、留宿工作没有个人的空间和时间、部分雇主苛刻待人甚至欺压或性骚扰女工、离乡背井的生活有各种不适应、对家乡家人孩子的牵挂……她们承受着身为基层工人及女性的双重弱势及压力。

虽然家政工在工作、生活中面临不少挑战，但是，在内地的项目中与家政大姐们接触，她们给我留下不少欢畅的回忆。在北京，我旁观了家政大姐排练表达她们工作生活的戏剧，并参加她们的小组活动，与大姐们聊天，她们在表演及言谈间流露的自信，姐妹间相互支持与鼓励的氛围，她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姐妹的心愿，令我很是感动。

再想到现在帮自己做家务的钟点工，她也有乐于助人的开朗性格，平日会当一些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在我家工作之

前，她已经是乐施会的每月捐款者（乐施之友），她从收入中每月捐出一点钱，长期支持乐施会的扶贫发展工作。乐施会与内地家政工结伴同行，香港的家政工也是我们的乐施之友。伙伴，原来可以这样联系。

在这本口述史中，北京、西安、济南的家政大姐们分享她们工作中的片段、感言，让我们感受到她们对这份职业的认真、尽心和待人处世的智慧。大姐们亦分享了她们生命中的重要经历，牵动人心。非常感谢她们的坦诚分享，让读者可以从她们喜怒哀乐的故事中，多角度、近距离地认识家政工这个群体。盼望未来家政工的权益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其劳动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尊重。诚心祝愿大姐们生活愉快！

口述史得以与读者见面，不少人付出了心力。家政大姐们开放地分享生命历程固然是最重要的。城边村网站让口述史这一构想得以实现，功不可没。特别感谢高欣女士，访问了多位家政大姐，并撰写及整理稿件。从字里行间，相信读者都会与我有同感，高欣是很用心地把家政大姐的生活面貌尽量真实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乐施会中国项目部的城市生计主题项目自2000年后，开始支持家政工方面的工作。从2006年起，家政工社群成为我们服务的主要社群对象之一。家政工的工作项目包括：为家政工提供培训与服务、举办各类社群活动，增强家政工自我保护能力，建立家政工互助网络与社会支持网络；政策倡导，完善家政工权益的法律保障；公众教育，促进社会尊重家政工的劳动价值。非常欣赏合作伙伴们多年来的坚持和

努力，陪伴家政大姐同行，在情感、互助、权益保障上，对家政工群体给予有价值的支持。尤其是在口述史中提及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之家、西安家政工工会和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为这本口述史的面世提供了积极协助。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乐施会同事们的付出，王英瑜、林虹、鲁梅花等同事花心思的参与，推动了口述史的诞生。

希望与伙伴、同事们共勉，继续与贫困弱势人群一起，推动社会关爱，共同进步发展！

李念先

乐施会中国项目副总监

2015年10月

前 言

一年前我正式接下这份书稿的任务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的小姨。

小姨和我没有亲缘关系，其实是照看我的月嫂。她生得白白净净，离开农村来到我家时，还不满 20 岁。

我的妈妈告诉她，她的工作只是照顾我，其他什么家务都不用做。给的工资，在当时算是很高的。

可是小姨聪明心善，看着我的爸妈做饭，竟默默学会了。相处时间久了，她总会在照看我的同时，尽量把饭做好。若还有闲暇时间，她就会把屋子打扫干净。

等我上了幼儿园，小姨回到农村老家。那之后，时光飞逝，只听说她几次出外打工，又几次回到老家，其间结婚生女，但再没做过家政工。

长大后，我几乎没再见过小姨，但每次想起她，心中总是会有一股暖意。这种感情，在我完成整本书稿后才知怎样去形容：她是这世间除了爸爸妈妈，第三个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爱的人。

于是，当正式开始口述史的资料收集工作时，我便一心想尽力做好，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私心：我想把它献给我的小姨。但同时我又明白，即使这本书出版问世了，我可能也

没有勇气把书交给她。因为，我没有合适的理由。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家政”这个称谓。

一晃三十年过去，家政行业从朝阳中一路走来，占领了各大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月嫂服务行业更是不得了，不仅有了一整套培训模式，还推进了月嫂国家标准的出台。我的小姨早已不再关注这些事情，但社会却拖着巨大的车轮，徐缓前行。

在我开始写作这篇前言时，月嫂国家标准出台，家政行业立法仍在路上，而在我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同事、同学开始高频率地讨论“如何、怎样、哪里才能找到靠谱家政工”这一系列问题。

月嫂、住家工、老年护理、钟点工、保洁……家政行业低调却已大面积地渗透并铺开在城市，以至于如果没有这些家政从业人员，家庭会崩溃，城市会崩溃。这样讲，丝毫不夸张。

然而，这本口述史并非一种宏观的关注，我们搜集并整理的，只是家政行业中十几位个体的经历。

这些经历来自北京、陕西西安和山东济南。城市文化和个人出身的不同，决定了每一位家政大姐的命运不同。在北京，几位家政大姐都是“北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背井离乡，独自打拼；而在西安和济南，大姐们都是守家在地，心中自然多了几分踏实。

在社会的极速运转中，家政行业缓慢发展，然而，与我面对面交谈的每一位家政大姐，都在自己的宿命挣扎。这份微小而又重大的家政工作对她们而言，有的是为了长见

识，有的是为了逃避家庭的不幸，有的却意味着全部的生存来源。

与这些大姐们的访谈在 2014 年下半年陆续完成，前前后后，一共 20 余位大姐接受了访谈，最终记录入书的，有 15 位。不能发表出来的口述访谈，有些是因为内容相似，有些是无效访谈，有些是尊重当事人希望低调行事的强烈意愿，而有些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同意公开个人经历的大姐中，只有 4 位同意使用真实姓名。她们将自己深埋心底多年的隐私和盘托出，我们也必然要尊重她们提出的这一小小请求。

接受访谈的家政大姐绝大部分来自打工妹之家地丁花剧社、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积成社”）和西安家政工工会的引荐。在访谈过程中，我亦有幸了解并观察了 3 家机构为家政工人们各自的城市所做的努力。

地丁花剧社脱胎于打工妹之家的家政工文艺表演队。成立于 1996 年 4 月 7 日的打工妹之家，是中国第一家为农村走进城市寻找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机构，家政工文艺表演队是机构开展各种活动的形式之一。

这支表演队渐渐发展为地丁花剧社。作为一家话剧社，地丁花剧社慢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爱艺术的家政大姐加入。一方面剧社依靠社员的力量慢慢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是社员，也就是家政大姐们依靠这种大家庭的温暖，潜移默化地学着乐观，更加乐观，甚至疗伤。

一位大姐在访谈时对我说：“哎呀，我感觉剧社给了我们很大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在那么大的舞台上表演……”每

每当参加或旁观剧社的活动，我不禁会想，这不仅是放松的场所，更是她们重获个体尊严的舞台。

在济南大涧沟村，积成社只有两位“80后”女生。然而，这两位姑娘，却在条件并不优越的服务中心办公地点，撑起了几乎整个村子家政工人的服务工作。她们既要搞清楚乡村的各种微妙关系，又要见缝插针地开展工作，实在不易。

有些家政大姐带着对生活 and 未来的绝望来到这里，起初只是为了瞧一瞧，却不想被看出了心事。“当时如果不是走进这里，被李老师发现我的情况不对，估计我就（自杀了）”，一位大姐这样说。

而西安家政工工会则更带有一种蓬勃的集体感。工会多由城市下岗工人搭台发展而成，这些姐妹们携手扶助着，走过了生命中几乎可以说是最艰难的时光。那种情感之深厚，已经渗透了她们每一个人的细胞。对老会员来说，工会不仅仅是可以寻求帮助和支持的地方，更是她们的另一个家。

几乎每一位大姐都会在访谈中不由自主地谈到工会对自己的巨大帮助与支持，谈到姐妹之间深厚的情谊，谈到工会的命运与未来。“只要是工会的事、姐妹的事，我们都是一呼即应的”，大姐们都这样说。

正是因为这些机构用一种几乎倾尽全力的方式，一方面为身边的家政女工提供力所能及的、实实在在的帮助；另一方面搭建了家政女工互助支持网络以及发声的平台，才能得到如此多家政大姐们的“死忠”和热爱。这也为我们的访谈提供了足够的信任基础和顺畅的沟通渠道。

这份书稿前后修改了五次，删减多于补增。我试图将访谈过程中的个人感受体现在文字当中，但最终效果还是更偏向于大姐们对我述说时的那般轻描淡写，我又很不愿将她们的信息过度加工。

打动我的，不是每一位家政大姐那些或悲伤或温情的往事，而是她们作为女性，在命运面前，努力追求独立和自由时所爆发出的那种坚强而隐忍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在旁观者看来已近于绝望、可当事人依然在埋头顽强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无法穿透一切现实障碍，却足以让个体熠熠生辉。

这些女性个体，不仅仅是家政行业的一分子——从没有名分到逐步获得权益保障；而且同时，她们还是女儿、妻子、母亲、中年人。生活的交错复杂全部体现在她们的这个生命阶段中，但她们并没有被压垮——拮据没有、刁难没有、迷茫没有、暴力也没有。

她们就这样隐忍地活着，她们会绝望、会叹息、会哭泣，也会欢笑、会安抚、敢付出。进入家政行业，给了她们一个看世界的机会，一个追求独立和发现自我的机会。潜移默化中，她们被家政行业改变了。她们变得更坚强、更有力量。

我不知道小姨当年在我家短暂的工作有没有收获什么，但直到如今，逢年过节，我们都会互相问候，亲如一家。

很希望给我讲过故事的这些大姐们的雇主，多年后忆及家中这位“外人”时，都能怀着感恩温暖的心。而且我相信，无论旧事如何，多年后，她们也一定会这么想的，因为这可以说是一种患难之情。

书稿写就后，我开始厌烦周围朋友提“保姆”这个称

呼，但我又知道，成见一时难改。在这个诚信缺乏的名利时代，我们不妨试着将掩埋的真诚、善良与尊重，最大限度地在家中释放，因为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家人。

这个想法或许与行业的规范化推进有些矛盾，但人终究是情感动物，终究都需要爱、需要温暖、需要理解，尤其是在家庭里。

衷心地感谢接受访谈的每一位大姐，你们的人生经历同样指点了我：应当如何活着。

所以我也很希望，读到这本书的各位，也可以感受到这份生命的力量。

谨把此篇不像样的前言献给所有正在从事或从事过家政工作的中国女性。

高欣

2015年7月11日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I / 001

序言 II / 001

前 言 / 001

北
京
篇

不愿成枣花 / 004

不再受大男子主义的气 / 015

丢掉最初的自责 / 028

双语家政 / 038

人生如戏 / 046

用头脑争取权益 / 055

西
安
篇

梁姐的人生 / 068

出路在哪里 / 082

把家政当成事业 / 092

姐妹情 / 105

王葳的焦虑 / 112

济
南
篇

村里最早的家政工 / 125

高大姐的家政工作原则 / 135

年轻的单亲妈妈 / 140

家暴人生 / 148

后 记 / 158

北京篇



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每天都在上演无数悲喜无常的真实剧情，就像一台无法停止的机器。然而，褪去城市的斑斓和机械，每一个奔波、挣扎于其中的个体，都过着本质上相同的生活。生、老、病、死，总是人类逃不过的宿命。

当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成千上万个家庭无法凭一己之力正常运转时，家政行业便以一种朝阳产业的新鲜模样，悄然兴起。而支撑起这个行业的主力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被称为“流动人口”的中青年女性。

据有关统计，2013年，北京市家政行业人员数量为43.2万；同年，据保守计算，北京市有近95万个家庭对家政服务有需求。因此，许多家政大姐同时兼做两三份工作便丝毫不稀奇。

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北京对家政服务的需求会逐年递增，到2018年或将达到150万个家庭。

因此，推进家政行业职业化的呼声与尝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2000年8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将家政服务员确定为国家的一种职业，也把家政服务业纳入了规范性发展的轨道。然而，十五年过去了，家政行业的立法一直在路上。

与此同时，4000多家家政服务企业逐渐在各个城市铺开，同样迅猛发展的，还有越发细分的家政培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个体的家政工人们，却在一个钟点一个钟点的坚持中，一点一点被缓慢赋权。我们访谈的所有大姐都觉得，现在是其家政从业生涯中最好的时光，她们也格外乐观，相信未来会更好。

然而，对于自身的命运，她们却依然感觉迷茫。

本篇选取的六位大姐，前半生几乎都守家在地，人到中年，只身来到北京，开始一段全新而未知的生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全靠自己一肩扛。

她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尊严、爱好与诉求，随着那些如烟往事从口中娓娓道来，她们不再仅仅是一个顶着“家政工”称谓的“外来务工人员”，而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有着自己思想的、有态度的、有情有爱有喜有悲的、有故事的人。



家政工劳动场景

摄影：北京市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

我出来为啥能坚持？在人家干活儿，尽管被看不起，但人家不会公开骂你，这一点就比家里好十万八千倍。没人打我、没人骂我，我任劳任怨地干活，这就是最好的。

不愿成枣花

二十多年前，一部名叫《篱笆·女人和狗》的电视剧风靡全国。剧中人枣花在农村受尽折磨，最终顽强地赢了命运，走了出来。

在电视剧播出后不久，受到枣花鼓舞的陕西农民刘清菊，把5岁的儿子留在老家，只身北上。她觉得自己要是继续在农村待下去，也会变成枣花。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刘清菊一直在北京打拼，从青年到中年。她进过拘留所，上过法庭，还离过婚。她无数次想要回家乡，但还是选择在这座给过她无数喜怒哀乐的城市中挣扎。

然而即使挣扎，刘清菊也不愿意让自己活得干瘪无趣。她爱学习爱思考，慢慢地，在时代大潮的涌动下，她的“北漂”生活不再仅仅为生存而打拼，而是变得越来越有趣和鲜亮，如同陈年的米酒，溢出了芳香。

被当盲流抓

九五、九六年（1995年、1996年）那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人特别没有活路似的，特别挣不到钱。家里3亩田，一年到头才挣500块钱，连袜子都买不回来穿。孩子的36块钱学费我也拿不出来，在家，就是等死。

刘清菊刚到北京寻出路时，才28岁。

人家说我最多25岁，一晃就老了，时间过得特别快。

如今的她这样感慨。

刚到北京，工作不好找，看个厕所都要中专毕业、一米六以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在饭店刷碗、做保洁的活儿。那时外地人被歧视，我们就跟过街老鼠似的。城里人把我们说成“站在街边数汽车”的人，因为找不到工作，也没地方吃饭睡觉，就是可怜。

有一段时间抓盲流，吓得哟，外面打个公用电话都被抓。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被抓过，包括我自己。抓了关起来，要钱，50块一天。我那时一天才挣10块。我被关了3天，朋友们把我弄出来了，交了150块。我不知道我被关在了哪里，那是有个3层院子的地方。当时是冬天，外面雪下得好大。

那段时间，刘清菊还照顾过小孩。

去的时候，孩子啥都不会，走的时候，孩子又会说话又会走路。

说到这里，她一脸的欢喜。

在老家，刘清菊学习好，虽然当时农村户口在城市户口之后录取，且分数线更高，她还是考上了县城的三所高中之一。她和丈夫也是在那时认识的。

他家离县城近，我家远。结了婚，因为我家穷，他家人看不起我，觉得我是深山里的，他家姊妹也多，不好相处，对我也不好。丈夫老打我，娘家家里又不团结，我没办法，也没地方去，就出来打工了。在老家没有活路。

就这样，刘清菊做出了只身北上的决定。因为有着高中文化，她想问题想得更远，而且非常关注家乡女性的命运。

高中毕业出来，只有种地，收入微薄。可再往上推，我姐姐她们那一代，不是更难活吗？我眼睁睁看着我大上五六岁的几个姑娘被逼死。你说现在的社会，至于吗？那时候社会制度不自由，现在社会多好，我特满足。

那时有些人是被拐卖的，有些人却是自己想走。我嫂子就被拐卖到河北去了，可我觉得她自己也想走。我哥哥不是人，老打人家，把人家说得一文不值。当时没地方去呀，不去跳塘她干吗去啊？现在好歹可以出来打工。

在北京干活儿，人家不会公开骂你

在被当成盲流关起来的三天里，刘清菊认识了一位来自海南的家政工。

客户不给她钱，还打她。那时候受这种委屈，你没地方去申诉。当时北京人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到现在，有些老头儿老太太还是会看不起（外地人）。

即便如此，刘清菊还是觉得在北京比在家里好太多。

我出来为啥能坚持？在人家干活儿，尽管被看不起，但人家不会公开骂你，这一点就比家里好十万八千倍。没人打我，没人骂我，我任劳任怨地干活，这就是最好的。

最初，刘清菊一天赚10元钱，去北京西站买次车票，来回就要花掉4元。办暂住证要200元。

根本不挣钱，就是吃口饭，3天不上班就没饭吃。

即便如此，她也很满足。

在北京，我觉得，再难，就算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都要坚持下来。回老家，更没有活路。



家政工地丁花剧社成员在看剧本
摄影：王锐

时间走到了2005年。因为一场官司，刘清菊认识了“打工妹之家”这个公益机构，进而加入了地丁花剧社。

当时我在一户（人家）干活，看他家1岁的孩子。男主人因为吸毒被警察抓走了，女主人就哭，恨不得跪下跟我说等她男人回家再给我发工资。我看她可怜，就一直在地家干。我就觉得，

万一不给我钱，我就当发了善心。

没想到男的回来以后，女主人立马换了一个人似的，说“我就是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拿刀把我杀了，孩子你抱走”。他家100多万的拆迁款，全被男主人吸毒花完了。

后来我就跟他家打官司，可是不容易。去一趟法院，车费就十几块。开庭了，他家人说没空，就能不去，执行费和上诉费法院都让我出。两年后，工资才给我，等拿到手，钱都贬值了。我是赢了官司输了钱。

如今，这段往事已经过去十年，刘清菊已记不清当时的

具体情况。再次回忆，她只是禁不住感慨时光飞逝。

年轻的时候，觉得时间万年长，地老天荒的感觉，可一晃就过去了。不过现在社会制度、社会治安越来越好，起码我不怕被人克扣工资了，这也比那时候好十万八千倍！

省吃俭用学古筝

刘清菊性格有趣而倔强，总是顽强地维护自尊与自我。她最近的努力，是将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划清界限。本可以住家，她却坚持在雇主家小区租了间地下室。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过去，本该晚上七点走，可雇主经常九十点钟才回家，我九点就睡了，他们影响我睡觉。

这份工作月薪 4500 元，刘清菊只留 200 元零花钱，然而，省吃俭用的她却拿出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学习古筝。

所有的乐器里，我最喜欢古筝。我找了一对一的老师，120 元一小时，每周日学习两个小时。可我现在做这家，他们回家晚，我都没时间练！

刘清菊私下里把雇主称作“暴发户”。

他家有两个孩子，我在他家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不闲着，有时间就啥都干，洗衣服、做早点、擦地板，给两个孩子做的饭也都不一样。中午我跟老二一起吃，下午三点老大回来，我又要做一顿饭。

雇主还觉得我在家没事，我为啥没事咧？他们回家晚了还若无其事，不觉得占用了我的时间，还说“哎呀你去给我做点饭吧”“你去把我手机电充上吧”……本来说好的每天十小时，但没有签合同，就没有第三方监督，我也不好说。所以我坚持干，过完年就不干了。

即便如此，她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坚持。

最大的好处是家里没人，我自由，而且我在家干啥，雇主都不说（挑）。而且我觉得，只要工资给我了，我也啥都不说。我现在就想怎么让自己的日子越来越过好。

谈及家政这个行业，刘清菊攒了一肚子想法。

相对来说，做家政比较稳定，工资还算比较高，除了辛苦一点。我们的劳动付出是别人的两倍，报纸上都说家政工挣钱多，那你怎么不去啊？当然是不容易的。

在每家每户，同样的劳动，工资是不一样的，有500元浮动；我们受的委屈、花的辛苦也是不一样的。每家都有一个特别不能容忍的点。我现在这家，最大的好处是不多事，最不能忍的是老占用我的时间，有时休

息日也不想让我休息。

我为啥喜欢来剧社聚会，就是在这儿聊聊天。没干过这个的人不理解，我们回家了都不说。上次我拍了个视频拿回老家看，看得他们都流泪，说你们真不容易。

我们这个活儿，是要坚持才能挣到钱。你三天两头不干了，十天半个月找不到工作，不知道哪天才能找到活儿，找到一家，又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让你不能容忍。不能容忍的事，我一般不说，不干了我就走人。雇主心里都知道。

还是想回家

即使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对于北京，刘清菊依然没有归属感。

其实谁愿意在外面打工？背井离乡的，北京空气又不好，人也容易得病。我在雇主家看孩子，咳嗽、感冒都不敢得，得了人家就不用你了。我几乎一年都不咳嗽、感冒，特别注意，就靠这个（健康）赚钱的。

然而，随着年纪一天天增大，刘清菊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养老问题。于是，她规划了一下自己的未来，一面等政策，一面存启动资金——她想回老家做旅游。

我家在秦岭以南，房子都是修在森林里面的，河里

的石子颜色、形状特别清晰，路上一眼望过去没有人，草就是草味儿，泥巴就是泥巴味儿，一路上，只听着鸟叫声和微风声，特适合做旅游。我们那里产的鸡蛋也原生态，还产无花果，都能卖好价钱。

之前我带一个雇主去我家，他说我家美得像欧洲小镇一样。雇主走的时候，还说要从北京给我带客人来。他来的时候，我说不要你钱，你给我家老人200块钱当见面礼就好，我同学来都是这样。可他走的时候，给我被子下面又放了800块钱，我家人还说让我给他退回去。

有了做旅游的想法和初步尝试，刘清菊便开始打听政策。

村里好多人都说我想的简直都是不可能的事。我说我们做旅游，当然不是一干就能成功的。你成功了，那行，你要是失败了，别人就会说你不行，你是神经病。

只要经济独立了，就什么都独立了

刘清菊的儿子今年23岁，哈尔滨理工大学毕业，现在在深圳工作。作为母亲，她又开始操心给儿子娶媳妇的事了。可就是这件事，她也能“推而广之”。

现在农村娶媳妇都要几十万，男孩子不好找对象，（这）是因为以前大量地生男孩不生女孩，生了女孩不

要，扔了，或者整死。

刘清菊没时间也没钱去深圳看儿子，有时间了，还是想赶紧回老家。她最喜欢在夏天回去。

每次都想，回了家了，不回北京多好。可老家又没发展，就是磨时间。所以我想，回家想干啥就赶紧启动了干。

现在，她打算用树林抵押贷款，以换得 10 万元的启动资金。但所有这些，只能靠自己。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过年我也不回娘家，在婆家住。三个小姑，一家一家来，婆婆吃饭的时候都不跟我说话。该吃饭了就叫我吃饭，把我当客人、外人对待。

最初去北京打工时，刘清菊的丈夫就反对。但她说：

只要经济独立了，就什么都独立了。我又不花你的钱，不吃你的饭，你管得着我吗？后来离了婚，过了三年旁人又劝，我又回去了。现在，就这么过吧。

刘清菊了解自己，她知道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了解社会，她知道自己的位置。

我喜欢学习，喜欢进步，当年我的英语是全班学得

最好的。按现在的升学率，我也能考上大学。可现在我不想这么多了，想多了也觉得没有活路。每天多想高兴的事，把幸福无限扩大，把不幸往小缩。有时你觉得自己生活不如意，那比你不如意的人多，咱又没生病，又没有无缘无故遇到官司，不应该感谢生活、感谢社会、感谢这个社会制度吗？

刘清菊知道，再难，她也不会成为枣花了。

我怎么劝她，她都说着想死。最后，我用当时雇主大姐劝我的话对她说：“人五百年才轮回一次，不容易，得好好活着。你出来找妇联，别拖泥带水，整利索了出来。”

不再受大男子主义的气

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雪华都极其不愿向旁人提及自己的过往。家庭暴力，在她看来，是一种羞耻和软弱的象征。

然而，所有那些不堪回首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到不真实的往事细节，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在北京做家政时，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雇主、同行以及地丁花剧社的姐妹们。在这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懦弱一点点褪去，李雪华慢慢找回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勇气。

元旦，她竟主动将自己的家暴经历写成了小品剧本，在剧社的元旦晚会上表演给几十位家政姐妹看。当她站在舞台中央，尽一己所能表演着当初的自己时，这位瘦弱的大姐，早已涅槃重生。

二十九年家庭暴力

我20岁就结了婚，当时带着我妈，嫁给了隔壁村书记的侄儿。婆家人口多，但可穷可穷。几桌菜一吃，就算结婚了。当时我想有地方住就踏实了，没想那么多。

结婚三个月我就怀孕了。当时前夫在学开推土机，每次回来兜里都会装几个苹果给我。我搁被窝里，晚上自己偷着吃，觉得可幸福了。可这幸福日子就只过了一年。

我儿子正月初九出生，早产，出生时才3斤多，婆家嫌弃。我还没出月子，前夫就让我下地洗衣服。我让他去洗。要是出月子了，我才不用他。结果他正洗着，我婆婆叼着烟进来了，说“那么娇气……”

那天晚上，我跟他说：“我饿了，给我拿点儿蛋糕呗，再给我倒点儿红糖水。”他就开始骂，说：“怎么事儿那么多那么难伺候，自己不会拿啊，整天在炕上躺着。”我就哭，他又骂。我还了一句嘴，他就把我从炕上拖到地上开始拳打脚踢。

这是他第一次打我。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动拳脚。

一次，他拿小方凳照着我脑袋打。我躲不出去就用手挡，当时手就肿得鼓了起来。凳子从中间劈成了两半，你说他使多大劲。我二姑姐也不拉架，就像外人一样看热闹。

当时我孩子都两三岁了。那天半夜我就往外走，不想活了。后来又怕死不了，就又返了回来，半死不活不还是自己遭罪？

他打我最狠的那次，是某一年的腊月二十九。那天，他堂弟结婚，我俩一起去参加。晚上八点他要回家，我说想看看闹洞房，他就生气了。回到家他就骂上了，说：“你看那儿好那你就跟那儿过呗。”我也年轻气盛，就互骂开了。接着，他就把我头打破了。我去找他妈说理，当时远房亲戚们都在，都跟他妈说“你管管你儿子去”。结果，他妈过来我屋，扔下一句“儿子不敢打媳妇”就走了。他妈刚走，他拿起小收音机就冲我扔了过来，我接住了。他琢磨他妈的话呢。

那晚，他把家里东西全都摔了，把孩子吓得嗷嗷哭。然后他拿起我的围裙，把我绑到炕头的三片暖气片上，开始拳打脚踢。

他打我打到凌晨两点多，打完就呼呼睡着了。我想上厕所，就叫醒他说：“求求你，我想上厕所。”他这才给我松开，然后又睡了。

从厕所回来，我就想摸电（自杀）了。我浑身痛，眼睛肿。但我又想，为了孩子，我不能死。孩子被吓成那样，回头找个后妈可怎么办呀？这样一想，我马上又松手了。他要是打不死我，我就跟他拼。

那年没有年三十，第二天大年初一，我还是去给他妈磕头拜年了。他妈看我进了屋，把脸转过去不理我。磕完头回自己屋，我跟他说：“在你妈面前，我都不如一条狗。”

每次他打我，我就是忍。我22岁那年，有一天，他拿起铁棒子、菜刀，都往我身上扔。我就跑，菜刀穿

过窗玻璃飞了出去，不跑就打我脚后跟上了。我害怕，先是躲在门后，又跑到邻居家。邻居把能打人的工具都藏了起来。

邻居老太太对我说：“你走吧，受他那些气干啥啊？你那么年轻，长得又不难看。”

我说：“孩子咋办？”

老太太说：“要他那倔根儿（倔强基因的孩子）干吗呀？不要了。到哪儿不生孩子呀，你那么年轻。”

我说：“我也没钱，而且孩子奔我来了，再找后妈更受气。”

老太太说：“管他那么多呢，自己不挨打就行了。你赶紧走吧，离婚你也离不出去，没钱我给你。”

我说：“我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拼，打不死拉倒，打死也拉倒。”

（这话）把老太太气得直说我倔。当时，也确实觉得没有地方去，没想到过出来打工。

我想过离婚，但我婶说他（前夫）叔儿是村支书，市里、县里全有人。而且农村封建，离婚也不好离。我就这么被吓唬住了。

获得支持

来到北京做家政后，李雪华经历过许多雇主，有洁癖老师、好事小三，也有好心大姐。在这期间，她的前夫也来到北京打工，对她的骚扰和谩骂从来没有停止过，反而变本加

厉。然而李雪华的心态，却因着见了更广的世界，而慢慢地改变了许多。

我曾在一户大姐家干活儿。大姐做房地产生意，对我挺好。她家人口多，吃饭不固定人，一顿饭最少五个人吃。有时候正吃饭呢，又来了人，就得去加菜。

第一个月大姐多给了我500块钱，奖励我的。大姐说：“你干得挺好。以前阿姨嫌我家人多，不高兴，老弄得锅碗响。”

大姐是河北人，我不晕车，她就老带我北京河北来回跑。在她河北的家里，还有一个阿姨做饭。这样我有了伴儿。

我一个月四天假，为了多挣钱，就只休两天。当时我给我前夫找了个在通州看院儿的工作，休息日我就上他那里去。

一年夏天，大姐生病了，我给她熬汤药，就一个多月没休息。他就天天打电话来骂我，说话可脏了，还说什么“不回来了，住那儿了有人养你了”。我说大姐在河北病了，他就说“在美国的也回来了”。

我和河北阿姨住一个房间、睡一张床。她听到了，对我说：“这样的人，别要了。”我说：“有孩子没办法。”

实在受不了，我就让阿姨帮我劝，结果他还骂阿姨。最后阿姨说：“我不劝了，你关机。”然后我俩就去做饭。等吃上饭，我开了手机，还挺客气地回他短信说：“对不起，我在做饭没听见你电话。”结果他电话又打过

来了，又开始骂。我就哭，觉得活着真没意思。

大姐看出来，非让我上桌吃饭。等我坐下，她说：“吃饭啊，吃完饭还得干活儿呢。人啊，一辈子不容易，五百年才轮回一次，做一次人呢，要好好珍惜人生。”

我到北京都这么多年了，他还老是打电话来骂我，半夜一两点也骂，说“你就是不想回来，在外头野了翅膀硬了”，还老说要扒我皮。我怎么说都不行，我老想，别人怎么过得就那么好，凭什么我就这么不好。

后来，做房地产的大姐去了香港，我没有跟着去，换了另一份育婴嫂的工作，在北京照顾一个刚满月的孩子。

他还是老打电话来骂。雇主在家时，他打电话我都不好意思接。孩子两个小时吃一次奶，我老忙着顾不上接。那是2011年，我刚买手机，不会调静音，别人都能听见他骂。我特别烦，天天干活儿总想哭。

在北京我有个老乡——李姐。我的皮箱和衣服放在她租住的地下室里，一次休息，我到她家拿衣服，然后准备去通州找我前夫。

因为是地下室，信号不好，我没接到前夫电话，终于接到后，他就又开始骂。李姐说：“别理他，告诉他明天就回去了。”结果他半夜两点打电话过来，还骂。

第二天，他过来找我，我们四个老乡一起去吃饭。在饭馆里，三个女的劝他一个男的都劝不住。周围人就看笑话，我都觉得脸上挂不住。

我休息日基本都到他那里去。有一次他把门锁了、电话掐了，不让我回去上班，就让我天天陪着他，我就只能

跟他说：“求求你给我开门吧，你看院儿挣1000多块钱，以后怎么办？”

终于有一次，他又爆发了，说要来扒我皮。我正在李姐家，李姐对我说：“你赶紧回家，赶紧离婚，到家直接去法院，别去他家。”

离婚

他家哥们儿多，觉得媳妇打黄了可以再找，欺负我娘家没人。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那么多年，我忍了。现在孩子长大了，也出来工作了，我就觉得不能这么过下去了。

回了东北，我直接去了法院，说我是谁谁谁家的，要离婚。接待我的法官说：“他家的啊，他家都打媳妇，就老大不怎么打。我们都知道。离，不跟他过！”

庭长告诉我，要离婚得把户口本拿来，我前夫本人也得来。我就给他打电话，不敢见他面，怕万一他打死我。有时候在家忍不住时，我都想过勒死他。

他威胁我说离婚那天要在法院门口整死我，我就跟法官提前定好，他来了怎样怎样。然后我上派出所报案，让派出所出人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派出所说，没有案子他们不能随便出去活动。我说：“难道本人被打死了，成了案子，你们才管，那不晚了吗？”

派出所所长说：“我们有规矩。”

我说：“你们有规矩，那我不走，你们管晚了，也是

我遭罪。”我是真不敢回去，是真的害怕。

最后，所长给法院庭长打电话，让法院来人保护我，还对我解释说，他们确实是有这个规定。

办离婚那天，我走到法院门口，看到那里停了几辆面包车。从车上先出来他一个人，一把拽住我说：“离什么离，回家！”

接着车上下来六七个人，还有一个女的，把我包围了。法院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人没动。这帮人就开始抢我，说什么“回家整死你、打残废你”。

我都被拖到车门口了，一看不行，上车就完了。我就倒在冰上不起来，吓唬他们说“我不行了快来人救我”。

法院门口那人一看这样，才说：“住手！你是不是叫×××啊？”然后他走过来说：“太不像话了，这是你们家啊？这是法院门口！太没有王法了！我看你们半天了知道不？”

接着，我们就都被叫到了法院。庭长单独跟我说：“一会儿指定给你办，别看他老叔是村长。受这么多年气，你早该来，为什么现在才来？”

我答：“听说他老叔是村支书，哪块儿都有人。”

“你还听他的，法院能成他家的了？”庭长说：“他家这事我们都知道，你俩也不是一路的，他也太猖狂了。这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这么说两句。”

然后，庭长把他叫进屋，问他是否有过打人的事实，他都承认。我这下心里就有底了。最后，庭长按照程序对我们说：“得给你们调解时间，今天都回家吧，能

过还一起过。”

那晚，我住的旅店。第二天，他一个人去的法院，他耍赖，还给我下跪了。

我说：“是你张罗离婚的，以前为孩子，我都忍了。你在外面养小姐，我也忍了，你还拿我当傻子。我实在是够了，孩子也说，不能过就离，大人的事你们自己解决。”

他看我这么坚决，就让我净身出户，挣的工资还得给他。我说：“我在北京挣的工资基本都给孩子了，我在家里种玉米的钱你也都给我挥霍了。”

他就说：“我不签，我要回家，明天再来。”

我激他：“你是男子汉吗？”

他说：“是啊！”

“是男子汉说话就得算话，你说今天签字今天必须签。”

“签就签呗！财产一人一半我不签。”

“我啥都不要你的，我自己现挣。”

“你净身出户！”

“我什么都不要。”

打字员挺好，其实打的是共同所有的夫妻财产一人一半。我看了大概是这么写的，就签了。我估计他也不能细看，果然他拿起就签。

从法院出来后，他就骂法庭，然后跟我说：“再一起吃顿饭吧。”我答应了。

吃完饭，他问我要不要回家看看妈。我说：“我不去看妈。对我好，我去看，这么多年，我没跟老太太吵架，我都忍了让了，老太太后来没地方住，我还让她来

自己家住，自己拿钱给她装修。她还说我出来挣的钱都是不正经的。”

这些说出来别人都不信。人们都说：“你婆婆对你那么不好你还这样？”我说：“人都有老的时候，让她自己想吧。”

将往事写成剧本

最初与李雪华接触，地丁花剧社负责人阎成梅不敢过问她刚刚结束的婚姻。发现李雪华喜欢拍照后，阎成梅便经常鼓励她多出去走，多拍照片。慢慢地，李雪华的状态好了起来。

虽已年过 50 岁，李雪华的身材依然很好。阎成梅鼓励她加入剧社。在阎成梅看来，李雪华最大的长处是“在舞台上胆量，背台词的能力很不错”。

2015 年剧社的元旦晚会上，李雪华把自己的家暴经历写成小品剧本，并勇敢地站在舞台上，自己主演。在演出过程中，台下一些观众不时愤怒地喊：“什么男人啊，不跟他过了！”

在这部小品的排练过程中，李雪华还是会哭，也还是会提醒阎成梅“这个事情尽量不要跟别人说”。

但在阎成梅看来，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她和以前语调不一样，不会像以前那么不好意思。”

加入剧社这几年，李雪华从最初不能提及自己的经历，慢慢转化到如今可以主动讲述；也从最初“小女孩般害羞”

的状态，艰难转型到如今勇敢而坦然地面对。这其中，剧社以及剧社的其他家政姐妹，给了她很大的支持。

“刚开始，每次说到自己的经历，她都会哭。”阎成梅说：“她哭我会抱她。我说这个事情不是你的错。你站出来，告诉其他姐妹，你就是个榜样，可以拯救很多人。不要觉得羞耻，别人知道了会支持你，同时你又帮助了其他人。”

李雪华已经成为地丁花剧社至今被采纳剧本最多的人。元旦晚会上的小品，她的原剧本框架几乎未做修改。那之后，有其他机构发出邀请，想把这个小品搬到其他社区表演。阎成梅问李雪华介不介意，李雪华说“不介意”。

后来，阎成梅听说，小品的再次演出又获得了成功。依然是李雪华，再一次站在舞台上，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演给更多人，她希望台下的姐妹不要再像自己当年那样傻。

成为支持者

现在，我彻底不跟他联系了。这两年精神刚缓过来，刚离婚那两年，一想起来我就哭。忍受了那么多年，我当时怎么就没打他几下啊？心太软也是一种毒药，一种没有解的毒药。总想着别人，可谁能理解你呢？

刚来北京时，碰到不合适的活儿我也不想干，晚上出门转向，忍不住呜呜哭，也顾不着别人笑话，就是忍不住。

后来通过一个姐妹认识了地丁花剧社，常来这里活

动、演话剧，心情慢慢好了起来。但有时晚上睡不着，想到这些事，又会不好，觉得自己那么多年白干了，房子他住着，钱他也没有给我。但我安慰自己：唐僧有九九八十一难，我这也该好了。

在北京，我也认识了一些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姐妹。

有个山西的妹妹，每天乐呵呵。当时我总是以泪洗面，她就劝我。我说我羡慕你们。她这才跟我说，自己也是在家挨打受不了才跑出来的。

我问孩子咋办，她说：“最小的20了，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后来这个妹妹被家里骗了回去，刚进家门就被打坏了腿，家人看着她，出不来。她发短信给我说“姐，我不想活了”，我看见这句话，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回她说：“你别傻，想开点儿，不行的话就再想办法出来。”她只回我“活不了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她接起电话就哭。我说你把伤养好了，上妇联，跟他离婚，我忍受了这么多年，我知道那种滋味，太折磨人。

她说她出不去，瘫了半个多月了。我怎么劝她，她都说想死。

最后，我用当时雇主大姐劝我的话对她说：“人五百年才轮回一次，不容易，得好好活着。你出来找妇联，别拖泥带水，整利索了出来。”

这话管了用。她说：“姐，那我听你的。”

后来她跳墙跑到朋友家，找妇联，妇联不管，又找

了当地派出所和法院，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劝所有和我有一样经历的姐妹走出来，别再困惑，别再受那些大男子主义的气。咱出来凭劳动挣钱，别受气，实在不行就不过，别再忍受了。



家政工地丁花剧社演出《我的劳动尊严与梦想》

摄影：北京打工妹之家

找着找着看见高叔，他正看人下棋，我说：“高叔我大妈呢？”大叔背着手说：“不知道。”我说：“你咋不知道啊，你俩一起啊！”然后我就哭了，还打了他两下：“你快告诉我，你把我大妈弄哪儿去了？你要害我是咋？”

丢掉最初的自责

刚进剧社时，张惠兰很胆小，任何活动都只是站在旁边看。她处处看别人眼色，这让她一度很自卑，也同时给了她极强的洞察力。

最初的张惠兰敏感、容易自责，在剧社大家庭的支持下，她逐渐变得强大起来，敢于和雇主、陌生人、不同群体平等交流。她的女儿都说，剧社让母亲改变了很多。

张惠兰来自内蒙古，有一个女儿。她说自己的家庭很苦，不想谈，怕影响心情。她曾在老家广播站有份工作，一个月拿四五百元的工资。干着干着，这些钱无法再保障基本生活。

一次参加朋友家孩子的婚礼时，张惠兰从一位老乡嘴里，头一次听说了“家政”这个新鲜词语。

那时很保守，我这老乡不敢说做家政，只说给别人做点饭。我问她我能去干吗？她说：“干得了，像你这样

还识字，肯定好干。”后来我打通了她给我的一个电话号码，就坐上火车来北京了。

2007年，张惠兰第一次来到这座巨型水泥城市。2012年，她加入地丁花剧社。2014年，她才首次讲出自己来京后的第一份家政工作。过去七年，她一直认为那份工作没做好，是自己的错误。直到剧社姐妹告诉她：“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

京城第一份工

我是农村的，没出过远门，大城市没来过，在北京北站一下车我就头晕。妈呀，这什么地方，人山人海的，幸亏有家政公司的管理人员过来接站。

这位老师把我接到公司，另一个女老师带我往地下室走，我心里特别害怕：“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当的活儿？不会被卖了吧？”

进了经理办公室后，王经理看见我，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就上下瞅我。我心里更害怕了：“这是要卖我啊……”

瞅完我以后，老师开了个条，让我第二天早上别吃饭，去体检，体检完了给我找活儿。然后经理问我：“你都能干啥呀？”

我说：“你们让我干啥呀？”

经理想想答：“那你照顾老人去吧。”

我特别听话，让干啥就干啥，第二天就去体检，完了也没有活儿，就等，心里挺着急，饭也吃不下去，坐立不安。

后来终于来了一个活儿，是照顾家里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来公司接我，说我“挺好挺乐观”，然后告诉我，家里就一个老太太，平时就我俩吃饭，几个孩子平时不太回去，回去也不是都一起。

我到她家一看，除了老太太，还有我们公司一个员工，听说这已经是她家找的不知道第十几个家政工了。老师跟我说这是考验我，最难的活儿我要是顶不下来，就只能回家等着再找活儿了。可我在北京没有家啊……

老太太家的邻居很好，看我没带多少衣服，就给了我一些。邻居还跟我说：“你这家可不好干呢，都换二十多个人了。”

当时，我没干过这种活儿，还特别想孩子。在家是咱说了算，到这儿得听人家的。光吃饭就不一样，农村人大锅大菜，城里人都小锅小气，做多一点儿，老太太都能说我一通。

我老想我来受这委屈干吗？但我不不想让孩子跟我一样，因为没念书在农村没啥出息。想孩子了，我就关上门到洗手间哭。老太太有时也能听见，她就在外面门缝，拄着拐棍说：“丫头啊，你别哭了，如果你想孩子，你就把孩子弄来。”

这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孩子们意见不

合，也没人回来看她。她的很多怪脾气和对我的刁难，我现在才理解。你说和一个外人住，她能放心吗？我俩素不相识，她不得防着我啊？我出来了都不放心家里，这不很正常嘛，可当时不理解。

我在她家干了24天。中间，接我回家的这个儿子也就回来过一趟。看见老太太刁难我，他对他妈说：“你可别老挑剔了啊，这个阿姨是最好的，你看她笑呵呵的，多好啊，你要好好待人家，别老折腾我了。”他儿子特别忙，老去换保姆也觉得没脸面。

老太太吃素，她儿子就跟她说：“你不吃肉，也一个星期给惠兰炖一顿肉嘛。”老太太这才每到周六等儿女回来时炖一小碗肉。我知道老太太是生活拮据舍不得，所以他们吃，我一口不动，让我吃，我就只吃一块。

那天老太太的儿子走时，把我叫到楼下说：“小张啊，我妈啥样我知道，你别往心里去，有啥事你跟我说，我把我的电话都告诉你。我妈脾气不好，你就看哥的面子，给我照顾下来。”

人家跟我说这话，我挺感动的。我说：“哥，你放心走吧，我会好好照顾大妈的。”

我也是现在才想明白，老太太肯定是想着自己儿子怎么向着外人，觉得她儿子对我好，才刁难我。

这中间有个插曲。我俩住一个卧室，一天早上五点，老太太说要出去。然后她坐着轮椅，我推着她，后面还背着尿壶，就去附近的公园了。

公园的老头儿老太太围了一圈聊天，旁边的（家政

工)阿姨也很多,我想过那边去,可老太太说:“不去不去,我不愿意上人多的地方。”我说:“好好,那大妈咱们去哪儿?”她说:“溜马路。”

早上我俩吃的馒头、咸菜,喝的粥,中间我老给她接尿,我也想上厕所,但不可能随地尿。我说:“大妈要不咱回去吧,我憋不住尿了,哪有洗手间啊?”

老太太说:“对面就是。”然后指给我怎么走。这时,一个老头儿扛着马扎过来了。老太太拉着老头儿给我介绍说:“阿姨啊,这是你高叔,我们老街坊,都十多年的了。”

于是我就嘱咐老头儿,说我上洗手间,快去快回,请他帮我照顾下大妈。可等我上完厕所跑回去,人没了,老太太和老头儿都没了!

我这第一份工作怎么就这样啊!我害怕,就跑啊跑,在大公园里来回跑了两趟,哪儿有人我就往哪儿跑,我也不问人。

找着找着看见高叔,他正看人下棋,我说:“高叔,我大妈呢?”大叔背着手说:“不知道。”我说:“你咋不知道啊?你俩一起啊!”然后我就哭了,还打了他两下:“你快告诉我,你把我大妈弄哪儿去了?你要害我是咋?”

“那你回家看去吧,”高叔说。

我就往家跑。一进家门,看见老太太坐在圆桌旁。这件事,老太太后来跟她儿子说了,她儿子又跟我公司老师反映,说我放下老太太自己去玩了。老师说了我一通,

说我失职。

我等老师说完，才把事情经过给她回忆了一遍，我问老师：“她随地能尿，我能尿吗？”老师听完说：“哦，这么回事，那对不起啊。”

在她家第25天，老太太的女儿回来了。我那时想家想得不得了，就想回公司看看。老太太一个人在家，我肯定不能走，看到她女儿回来，我便说：“姐姐，我回公司一趟。”

“你干啥回公司？”她女儿就这个腔调。

“我办暂住证去，来的时候没有办，”我说。

“大周天的谁给你办暂住证呢？你撒谎呢。”

“姐姐，我没有撒谎，我拿照片去送给老师。”

“把电话留下！”

“姐姐，我的东西都在这儿，我还用留电话吗？”

“……走吧！”

那天中午吃饺子，早上我就把馅儿做好、面和出来了。出门后，我一路跑到公司，心里也不得劲儿，见着老师就哇哇哭。

老师心里很清楚这家难做，安慰我说：“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不好干咱换一家。”我当时还挺刚强，说：“这一个月我一定要坚持下来。”当时的规定是第一次先签一个月，能干再续一年的合同。

“好。”老师说。

感觉还没说多少话呢，就到时间了。老师就撵我，我又小跑回老太太家。进门我就说：“大妈，我回来了。

姐姐，我回来了。”

谁都没有应答，我就知道：“完了”。

当时姐姐在厨房和馅儿，大妈在床上瞅我，都没吱声。我问：“姐姐，我干点儿啥呀？”

“把西葫芦弄弄，”姐姐说。

“姐姐，这西葫芦怎么弄啊？是擦啊还是切啊？”我刚来，什么都不知道，可不得问问。

“我们都切，然后弄碎了。”

然后我就刮皮，跟她说话，她一点儿也没有好言语。我觉得我要这样下去，下次她还得给我气受。我就说：“姐姐，你要是觉得我干不了呢，我走了，你伺候老太太吧。”

“告诉你，你走可不是我让你走的，你自己要走的！”老太太的女儿说。

我说：“是，我干不了了，我不走干啥呀，我不能白拿你家钱。”

老太太这时候说：“你别走，等我儿子回来。”

我和颜悦色地跟老太太说：“我不等你儿子，姐姐在家呢，我也没把你一个人扔下。我连个西葫芦都做不了，你说我在你家干啥呀？”

然后我就把邻居给我的衣服拿出来，铺开给老太太看：“你看，你家东西我没有。”

老太太一件一件衣服拿来看，她看完一件，我就装一件。收拾好了，我出来还了邻居。

从她家出来不多远，老太太的儿子就打过电话来

了。他问我：“你快回去吧，是不是又是我那个大姑奶奶啊？”我说：“这是小姐姐。”他就对我说：“我这些姐姐尽过来捣乱了，你回去吧，你看我也忙。”

挂了电话，我扭头看，也没人来接我，那我怎么回去？我当时也是不会办事，我要说个“你让姐姐来接接我”，不就行了。当时刚出来，心不在这儿，总还想着家里和孩子，想不到别的。

我等了一个小时，老太太的儿子也没来，我就挎着包回公司了。

老师看见我，“啊”了一声。我说：“那家姐姐说我回去晚了。”

老师说：“也不晚啊，那家太刁了。”

当天下午，老太太的儿子去结账，我偷听老师对他说：“我也不能再给你找人了，这人最老实，你们都用不住。”

等他儿子结完账出来，我俩在地下室走廊碰了个对面。他说：“惠兰，你真是的。”我就笑，没吱声走开了。

女儿也来做家政

我离家时，女儿在县城的寄宿制高中读高一。她一听说我走了，觉得妈妈辛苦，就不念了，也去打工。她在饭店干了一个多月，我都不知道。还是我哥哥去学校看她才发现，然后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这才又把女儿劝回去上学。

从那以后，每次放寒暑假，女儿都来北京，和我一起做家政。

女儿第一次给人做家政才16岁。老师极力推荐，被雇主接走了，可女儿去了啥都不会干，才一天就给送回来了。

后来女儿又去了一家，女雇主挺好，留下了她。到现在我还跟这家联系着。是人家接纳了咱。

女儿干了一个暑假，挣了些钱，走的时候，雇主还多给了她1000块。我们特别感动。孩子回来后，我俩抱头痛哭，我觉得孩子受罪了，对不起她。女儿跟我说：“妈妈没事，你锻炼了我，我将来自个儿出去，就会做别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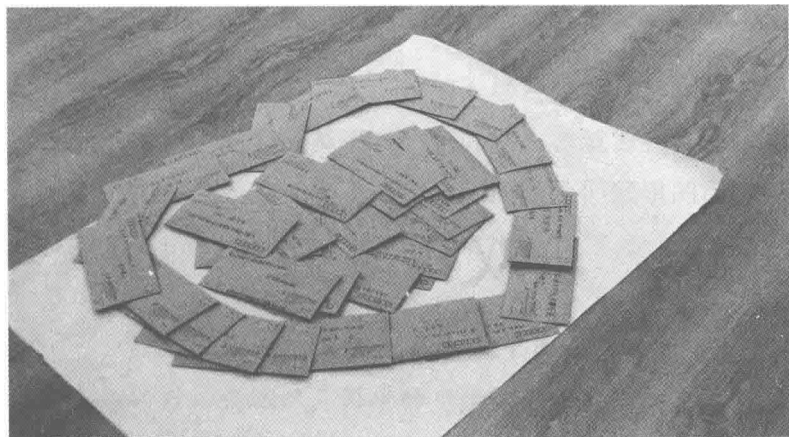
第二年，孩子又过来，这就好找活儿了。也是从那时起，我家孩子就更体贴我了，到现在也老打电话安慰我说：“妈妈，你不要老跟别人生气，遇到人打交道免不了生气，你就想着你为我挣钱呢！”

女儿今年才22岁，特别成熟懂事。现在什么事她都管我，为我想在前边。她毕业后的工作是去年的雇主提供给她的。那位雇主有家民营企业，就让她跟着进去了。工资一个月5000，签两年合同。现在，女儿经常跟着女雇主坐飞机跑香港。

这都是她自己干出来的。要是等她念完学才过来，我们上哪儿去找工作呀？真挺感谢雇主帮我们。

这就是家政给我带来的好处：第一是把我锻炼好了；第二把我孩子也锻炼好了；第三我们娘俩生活有保障。

要是在家里，那点儿地，早一年涝一年的，孩子也念不成书。



家政工的家书

摄影：北京打工妹之家

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代表咱中国人，对人家外国人不能不尊重，那样的话，是丢家政工的脸，也是丢中国人的脸。

双语家政

刘玉红有着陕西人的实诚和踏实，也有着农民特有的聪明与随性。后者在她身上表现得颇为有趣：在老家时，她就自学英语，而让她没想到的是，这门特长在她来到北京后，竟然给她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老外雇主

来北京之前，刘玉红在老家镇上经营一家小超市。由于紧邻学校，她的超市主要面向学生，一半卖学习用品，一半卖学生读物和课外辅导书。就这样，她便自学上了英语。

刘玉红好学，从1997年起，她就订阅《农家女》杂志。杂志里的那些打工故事深深吸引了她，让她越发想要到大城市闯一闯，这样，她也就更加努力地学习英语了。

一来，我就是喜欢学英语，好像不由自主地从心里就爱；二来，我怕出去以后有交流困难，如果碰到老外问路啊什么的，我怕有语言障碍。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人尽皆知的名言在刘玉红这里起了作用。因为懂英语，一到北京，她就被一位外籍雇主相中，在这户人家工作了两年多，照顾他们家里的小孩以及打扫卫生。

男主人是美国人，女主人是中国人，有一个孩子，人都特好。在这户，简单的口语咱还懂，可人家一说复杂的，就不懂了。我也不害怕，就跟户主聊天，也自学。他家有好多外语书，在那期间我英语学了好多好多。

一提到英语学习的进步，刘玉红就掩饰不住地欢欣。

具体到家政工作，刘玉红也同样用心。她觉得应该多了解美国礼仪，便上网查询。

美国的节日、习俗和禁忌，必须要看一看，比如火鸡表示什么意思，奶酪都是哪种，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都要提前大概了解一下。我不莽撞用人家的东西，该避免的问题尽量避免，不懂就问雇主。

在外籍雇主家，刘玉红把礼仪礼节方面的功课做得很足，除了性格使然，还有着另一层原因。

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代表咱中国人，对人家外国人不能不尊重，那样的话，是丢家政工的脸，也是丢中国人的脸。

这对跨国籍的主雇关系很融洽，直到第三年快到时，刘玉红才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雇主家要搬去云南，让我跟他们一起去。但我想，我的家人都在这边，又怕咱北方人到南方不适应。饮食应该没问题，气候肯定受不了，南方又热又潮……

于是在2013年，刘玉红正式下户。在这之前，她特意到市场上扯了被面、买了棉花，亲手缝了个小被子，送给雇主家的孩子。

孩子妈妈不会缝，市场上卖的现成被子质量又不好。

收到这份小礼物时，女主人高兴地跳了起来，连声说：“刘姐，你做的被子太漂亮了！太好了！”

2014年夏，云南昭通地震。刘玉红忙给前任雇主打电话问候。

我说“地震了没事就好”，孩子妈妈说“没事没事，就是想请你过来，要不你过来吧”。

刘玉红再次拒绝了这份邀请，原因如故。

回家的困苦

刘玉红的丈夫也在北京，从事装修工作。这是她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市的主要原因。她有一对双胞胎男孩，现在都已经工作。在两个孩子都考上大学之后，刘玉红才来到北京打工。

我早几年就想来，可家里好多活儿，再加上孩子们还没毕业。

刘玉红全家，每年春节回一趟老家。然而，每次回家，都像是一场战斗。

我自己经常买下午的票，一晚上在车上坐着。去年，我儿子给我买的是早晨六点的票，我们要在西安倒车。那天雪下得特别大，火车又接连不上，我就在车站附近宾馆住了一晚上，再上车。再下车是凌晨两点。火车站冷，雇了车开到我家都快五点了，把我累得……

那天，我的大儿子为了送我们，一天没吃饭。小儿子和我一起，我还吃了一口东西，他一口没吃。

我现在都害怕回家了。前年买的还是站票。买票时，我天天晚上到和平里的售票点，只要有票我就买，连退带换，花了50块钱手续费。不但费钱，心还累。每次回北京，我都想再不回家了，但到了春节，不回不行啊，家里还有公婆和我自己爸妈。

对于未来，刘玉红也觉得，以后肯定还是要回老家的。

家里盖那么多房子……等两个儿子都稳定下来，又得接着看孙子了……真的是忙不完啊……

现在，刘玉红有两份工，白天带孩子，晚上陪老人。一忙起来，英语就耽搁了。这让她挺无奈。

带孩子必须责任心大，孩子的饮食起居、玩耍，还有心理层面的，整体都要照顾到。我对孩子真的是全身心投入了，英语最近一两年就没学多少。

问及自己的儿子是否遗传了她好学英语的基因，刘玉红笑着说：

俩儿子英语不行，他们都是读理工专业的，就不学英语。

对学好英语的下一个期待是什么呢？她想了想，说：

有机会肯定想出国玩啊！

6:00 在大爷大妈家起床 搞卫生

7:00-8:00 坐车

8:30 在美国人家里先打扫院子,收拾厨房,打扫卫生 洗衣服

9:40-10:40 孩子起床 给孩子做饭

10:40-12:00 带孩子玩耍

12:00-1:30 做饭 吃饭

1:30-3:30 带孩子玩

3:30-和孩子睡觉,我叠衣服,收拾各个房间以及卫生

4:10-5:40 做晚饭 吃饭 (离开美国人家)

5:40-6:30 打车(坐车)

18:30-19:00 在大爷大妈家

19:00-21:00 左看电视和大妈大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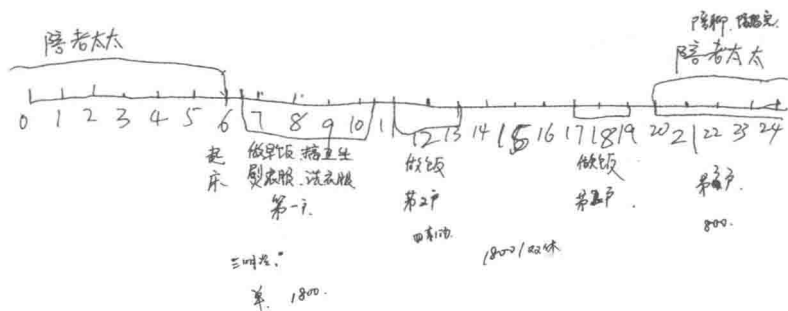
21:00-早5:30左右睡觉

一天的具体工作

工作日程

- 早 6:00 起床,自己洗漱,整理自己房间。
- 6:30—7:20' 做早饭,给宝宝妈妈煲汤,自己吃饭。
- 7:20—9:00 给宝宝挂备家居服,水和调奶粉的,和室外服,尿布,宝宝起床就开始带宝宝。
- 9:00—10: 给宝宝换室外服,带宝宝去室外玩。
- 10:—10:30' 回家给宝宝喝奶,喝水,换家居服
- 10:30 给宝宝妈妈挂备汤,带宝宝。
- 10:50—11:40 哄宝宝睡觉。
- 11:40—12:00 自己吃午饭,(这期间还得照顾孩子)
- 12:00—13:30' 陪宝宝玩。
- 13:30'—14:50' 陪哄宝宝睡觉。
- 14:50'—15:00 给宝宝喝奶,换室外服。
- 15:00—16:30 带宝宝在室外玩。
- 16:30—17:20 给宝宝吃水果,米糊。
- 17:20—18:00 做晚饭(主菜,荤,汤)。
- 18:00—19:00 带孩子,雇主吃饭。
- 19:00—19:15' 自己吃晚饭,给宝宝挂备换洗衣服。
- 19:15—19:30 陪妈妈给孩子洗澡,换衣服。
- 19:30—20:30 收拾厨房卫生,给宝宝洗衣服。
- 20:30—21:00 收拾整体卫生,收衣服,整理。
- 21:00—21:30' 自己洗澡,睡觉,进自己房间。

家政时间统筹表



三个家政工的一天

摄影：北京市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

酸甜苦辣，我们都尝过。干这个活儿，就是要心胸宽一点、大度一点，替别人着想，宁愿自己累点儿。要舍得出力，自己有多大技能，都要拿出来。

人生如戏

对许多家政工来说，她们更喜欢照顾孩子而非老人，更喜欢有户外时光而非整天被锁在家里。王月娥却是个例外。

王月娥学过唱戏、自学过医学，靠着她的两样“独门绝技”，她和难打交道的老人们相处甚欢。

与二胡大伯的快乐时光

在老家时，王月娥曾因家庭问题而一度心情低落。父母为了帮她走出阴影，便鼓动她参加了村里的戏剧班。唱戏为王月娥打开了一扇透新鲜空气的窗。从那以后，有事没事，她都喜欢唱上两句。

在北京做家政时，她曾特别碰巧地遇到一位有着共同爱好的雇主老爷子。

大伯以前拉二胡的，我就给他唱，在他家客厅跑场，老人特喜欢。这样不出门，我们也不会闷。

老爷子70多岁，患有脑梗、抑郁症。王月娥刚上户时，老人只能吃流食，一次只能说两到三个字，翻身也需要人帮助。老人的儿子嘱咐王月娥“没事多陪大伯说说话聊聊天”。

于是，王月娥每天给老人放音响，给他唱戏唱歌。慢慢地，老爷子变得开心起来，再到后来，竟然能说出完整的话了。

最初，老人的儿媳对王月娥有偏见。

我刚来，她就问我：“带梳子没有？”我说：“我这么长头发肯定带了，我的生活用品都带了，不可能用你们的吧”。大伯也说他儿媳妇想事情简单。其实那之后，她对我挺好的，但她防我。我说：“那你把房间锁好，外人不进来我也不出去，这样你安全我更安全。”

作为住家的家政工，王月娥几乎不出门。

好像跟坐监狱一样。我不买菜，没菜了就跟他们说，东西都在冰箱里。我没他家钥匙，我也不要。

2013年，王月娥这一份照顾不能自理老人的工作，工资是3500元/月。每天，她给老人喂饭、按摩、换药、唱戏、放音响。凭着对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元旦时，她拿到了雇主家发的红包，这让她倍感骄傲。

第三个月刚做完，王月娥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她不得不请假回家。

我走的时候，大伯还能说很多话，还能坐起来吃饭，吃得可有精神了，身上还长了肉。临走前，我教了接替我的姐妹整整两天。要不是我妈催得紧，我肯定不回家的。

待老家父亲的病情稍微稳定下来，这边老爷子的儿子已经催过好几次，说前后又换过两位家政工，都不如意。王月娥赶忙回京，谁知回到雇主家第二天，老人就去世了。

我估计是之前的家政工给老人打流食打多了，拉肚子拉脱水了。家政工和老人的儿子都觉得拉个肚子没什么，大意了一下。结果我到了第二天，看老人就情况不好了……

如今回忆起来，王月娥还是很遗憾。

遇到好雇主不容易

关于最初为何决定做家政，王月娥的回答很简单。

我感觉自己没什么本事，去打工做什么？只能是家政。

2008年，王月娥曾在西安帮一户福建家庭带9个月大的

孩子，她一路把孩子带到3岁，直到回家伺候妹妹月子。

后来我就帮妹妹带孩子。中间妹妹说让我出去放松放松，结果我一放松，就又干了一个月家政。可刚过一个月，我妹妹又不会带孩子了，打电话让我回咸阳。我妹妹也给我工资，别人给1000，她给500。

在西安时，王月娥曾经护理一位老人。老人不能自理，一小时吃一次药，十几种药，王月娥都要记清。当时她每月拿1400元工资，每天给老人做饭、洗脸、吃药，陪老人聊天，说笑。

有一次老头儿跟我说，你看我年龄大了，没用，放个屁都咚咚响。我说大伯，那不怕，屁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在你的肚里滚来滚去，一不小心掉了下去，放屁的人洋洋得意，闻屁的人非常生气……我天天逗老头儿开心，可热闹啦！

下户时，老爷子拉着王月娥的手哭，家人也哭。

人家找个人不容易，咱遇到个好客户也不容易。我也舍不得，走的时候，心情好难受。

而为何又来北京，王月娥的回答也很简单。

在西安干过，就再去北京逛逛吧。

来到北京，王月娥参加了月嫂培训。

北京的培训比西安细致一些，知识面更广，工作要求也更高。

在这座城市，她的工作依然是照顾老人或孩子。

2014年3月，王月娥照顾了一位66岁的老人。老人腰椎间盘突出骨折，王月娥每天扶着老人练习走路，竟然起到了作用。

把我的肩周炎带犯了，两个胳膊都肿了。

后来，她以此为蓝本，创作了小品剧《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并在2014年8月的戏剧演出中登台表演。

提到自己偶然加入的地丁花剧社，王月娥满是感恩。

感觉剧社给了我们好大的名分，让我们学了好多东西，认识了好多人，好像把我们家政工抬高了。我怎么都没想到这辈子能上舞台。能上台演出，我们就很高兴。

在北京，王月娥前后在七八个家庭做过家政。工资比西安高出近一倍，或者更多一些。

老年护理多一些。我更喜欢带孩子，心情好，热闹。但我这个年龄段，不适合带孩子了，人家都要45

岁以下的。

王月娥也做过一些受气的活儿。

在和平里的客户家，我头发掉了好多。我不跟客户说，就给公司老师发短信。老师说不行你就下户吧，我说再坚持两个月。

那家老头儿90岁，心脏做过搭桥，有些脑梗，人可（很）老实。老太太心脏不是太好，但两人都能自理。老太太事儿太多，每天早晨五点半起来就乌鸦嘴，我做什么她都不放心。我做饭她不放，她做吧，还说：“瞧你干的什么活，我们家请你给我做饭来了，这还都不是我做的”。

他家孩子接我来的时候就嘱咐我说老人事多、爱嘟嘟，我说没事只要我吃饱就行了。结果我还是没吃饱。我不说，说那么多话不起作用。坚持到过年我就回家了，好难好难的。

后来另一个客户跟我说：“沈姐呀，你真是好肚量，公司老师跟我说，之前你上的和平里那户，老两口都换了26个阿姨了，就你坚持下来了。”

在王月娥看来，家政活儿就是受气活儿。

不过看你怎么理解和沟通，酸甜苦辣，我们都尝过。干这个活儿，就是要心胸宽一点、大度一点，替别人着想，宁愿自己累点儿。要舍得出力，自己有多大技

能，都要拿出来。我在西安时，还给老人缝衣服，什么都做，反正就那么些活儿，也不重。太阳出来干活，太阳下去睡觉。无论哪一家，我都踏踏实实干。

被迫中止家政

我喜欢医学，19岁就学会了打肌肉针，结婚以后也帮村里人打针。以前在老家，我经常给鸡开刀，一看鸡脖子，我就知道能不能救得过来。生小猫小狗小羊小猪，都是我接生。家里的羊生病，我不请兽医，自己给羊打了二十针，救过来了。有时候我还给自己打针，在自己身上学，慢慢地，开始救人。

在痴迷于唱戏之前，王月娥就喜欢医学，并自学了不少医术。她的一个“绝活儿”是掏痰。

一次在回娘家的路上，我遇到一个50多岁的妇女带着2岁左右的孙女去诊所。孩子气管炎，在自行车后座上直翻白眼。我就跟着一起去了诊所。医生说需要掏痰，但医生手大掏不了，就撑开孩子嘴让我掏。这样，我把小女孩救了过来。

那之后，王月娥又用掏痰的方式，救过自己父亲和儿子的命。从事家政工作后，这个技能又被她用到了老年人护理中。

然而，热爱医学的她却没能拯救自己的丈夫。2014年10月2日，王月娥的丈夫遭遇车祸。次日，她从北京赶回老家。

这次老公出事，我一个月掉了7斤肉，所有事情都要我一个人操办。我也不怕，我当了三十年女当家。我娘家弟弟、婆家大哥、村干部、村里人，都来帮忙。

当时是小姑的儿子开车帮我家搬东西时出的车祸。因为无证无照，所以这起车祸，双方都有责任。我也不能问我小姑要钱，因为是人家帮我家搬东西出的事。最后，对方赔了我家20万，私了够了，多少钱是个够。丈夫住院花的五六万，对方也认了，这就行了。

医院当时说我丈夫是大脑死亡，内脏都好，但氧气一拔就不行了。我到镇上去给他买寿衣、买车上挂的红，等等，拿到医院去，在县医院旁边给他放遗像。最后一起让救护车拉回家。

我丈夫很老实。1986年我们结婚，快三十年了，我们的大儿子都27岁了。我的遗憾就是他辛苦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家里房子刚盖好，账刚还完，他就走（去世）了。以前每次我回家，他都给我端洗脸水、洗脚水。家里没暖气，早晨我起不来，他就给我做饭。

现在，王月娥的公公还健在，她自己的父母身体都不好，她需要两头跑。两个儿子都在苏州的电子厂做工，如此，家庭负担都落到她一人肩上，再回北京做家政，就遥遥无期了。

前段时间，北京有一个住家、不休假、每月5000的工作。家政公司的老师喜欢我，打电话让我去。我跟老师说，我妈妈住院，爸爸挂吊瓶，婆家公公也没人照

顾，丈夫没了，还要给儿子盖房，回不去。

但王月娥打从心眼里喜欢家政这份工作。

我想过，还可以在西安干，每个周末回家给老人洗衣服做做饭，儿子还要娶媳妇，还得打工。以后有机会，我还是想去北京，现在家里老人是第一，我走不开。



家政工劳动场景

摄影：北京市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

我就认为，我找了份工作，我把这份工作干好，也不觉得他们（雇主）比我高傲。我要从各个方面让他们感觉到我的素养，细致到吃饭的姿势，慢慢地，他就会接受我。

用头脑争取权益

张凤兰总是笑眯眯的，言谈举止透着些优雅范儿，但她确实生长在农村。虽不是“老家政”，但她洞察力很强，大到行业，小至客户，她都看得明白。在遇到矛盾时，她也总能很好地化解。她还特别善于总结经验，并与其他家政姐妹交流。以下是她的自述。

对于家政行业和家政姐妹的建议

我干家政时间不长，2013年干了两三个月，2014年干了十个月，加起来也就是一年。在这一年工作期间，我发现，家政工跟其他工种不同，原因在于工作时间不自由。在工厂，工人都有条例规定，但家政工不同，各家各户的规定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脾气也不一样。

人总是在不断学习，能从老家走出来，就是成长。

比如我原先不会做这道菜，现在我会做了，就是成长。我没感到后悔。

据我观察，家政行业有这么两个情况。

第一，老师给我们上课培训时，教我们怎样更好地对待老人。但我们这份工作，没有权利干涉和要求老人。只是一味地要求我们怎样怎样，没有人要求雇主怎样怎样。所以我们每个员工都是顺着雇主。

一个公司怎样对员工（家政工），应该有个标准；可千家万户需要家政工的家庭，却没有一个人给他们规定标准和条例。

居家养老，国家还在不断推行，将来会走正规化。以后可能会发展得更年轻、更专业。我们家政工可以集体学习，提高素质，不停了解老人的身体情况和个性特点。可作为雇主，应该怎样接受员工（家政工）到自家工作？这个课谁去给上呀？国家要支持这个行业，客户（雇主）也要学习，但家政公司老总也不可能去每家每户给他们上课。

我接触到的百分之八十的雇主都是比较有素质的，可就是有一些人，把你对他们的尊重认为是一种享受——“你是在我家还是我在你家？”你看，作为客户、雇主，这句话说得多么没水平呀，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第二，我们上户，健康证是最起码的。但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照顾的老人有什么病没有，传染不传染。我们也是生命。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的人格跟他们的是不平等的，我感觉我们的生命不如他们。

当然，客户也有客户的苦处。比如员工承受不了时可以下户，但对客户来说，就马上面临着要找人的困难。所以我还有个建议：让家政行业正规化。大家可以签合同说明到哪天停止，这样大家心里都有数。

对客户，我们可以斗智，但不可能跟他们斗。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执着、耐心和热情，去换取长久的考验，客户慢慢就跟你好了。如果碰到素质特低的，那我可以放弃这份工，我不是来跟他斗的，我是来工作的。只要是差不多的，我都会尽量感化他们。

人都是需要表扬的。如果雇主表扬，我就愿意多干活儿。如果他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绝对做不长。

以前有人问我，你们能把老人当自己的家人看待吗。

实话实说，父母是养育我的，是至高无上的亲情，没有人能代替。我们照顾的老人，在亲情上，跟我的父母相比，差一点；在工作上，我肯定要更周到。

确实是这样。比如，在自家老人跟前，今天我累，就可以跟妈妈说“今天不给你擦背了”，妈妈也能理解。但是对客户，你能吗？老人能把你当成自己亲人对待吗？他们的儿女经济条件好，就找个人来替他们尽孝；他们可以坐在那里，看我们给他们的老人擦背洗脚。

开始我还有点儿不适应，但后来我就没有一点自卑的感觉了。我就认为，我找了份工作，我把这份工作干好，也不觉得他们（客户）比我高傲。我要从各个方面让他们感觉到我的素养，细致到吃饭的姿势，慢慢地，他就会接受我。

家政工作不好的地方有两个。

第一是心理压力大。我们不像年轻人，找份工作，无牵无挂。我们是一家之主，上有老下有小，在别人家里干活儿，尤其是二十四小时住家的，既要考虑客户各方面的要求，还要考虑自己的子女和家庭。虽然工作需要出的体力不大，但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第二，有时干完活儿，饭菜都凉了。在自己家，会考虑凉饭菜吃了会不会不舒服，但在客户家，没有人管。只要人家不给脸色，吃凉的也无所谓了。

而家政工作最好干的一点是什么？如果家里有事，中间要走，工厂不会给工资，但我们三天也好，五天也好，半个月也好，这些天的钱都给我开，没白干一天的。

我不建议姐妹们跟客户闹矛盾。到了客户家，你可以这样说：“大爷啊、阿姨啊，咱们先试几天，你觉得行呢，咱就干，不行呢，我们公司人多，再给你找。”这样说，客户心里舒服，咱退的时候也方便。不要压力太大，去了感觉自己都要生病。

另外，我还建议姐妹们，干活的第一个月，尽量少说话，这段时间要尽量多地了解客户。跟客户说话，是在跟他们建立关系以后。

“过招”小片段

张凤兰也在雇主家受过委屈，但她会想办法，或争取个人权益，或实现双向谅解。从她的自述中，笔者选取了以下

几个有趣而又有一定启发的小片段。

我之前的雇主是个90岁的老太太，眼神凶巴巴的。我进她家第四天的时候，因为一句话争执起来，老太太走到电话跟前，拿起电话，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了一句你就不愿意了，你说你是干还是不干？”

在我家，谁这样说过我呀，我感觉自尊受到了伤害。可等老太太拿起电话，我冷静下来了：虽然到哪儿我都能挣你这3000元，但也不能跟老师说刚来就辞呀，这不太好；再一个，何必跟老人计较，不能为一句话赌气，人家儿子儿媳对咱也挺好的。

于是我就马上说：“大妈得了，别给儿子找麻烦了。儿子到公司去一趟也不容易。行，今天我不对，我不该跟你抬杠，挂下电话吧。咱再试试，行不？”

有一次，我穿了个纱短袖去雇主家，进门就奔厨房。

雇主说：“你做饭也穿裙子和纱短袖啊？”

我反问：“大姐，你说什么？啥意思？”

雇主看我一脸不高兴，赶紧解释：“我说你做饭的时候是不是有油啊？”

我说：“你这样说，那我就理解了。”

我照顾的老人一天要吃七八顿药，我总是洗了手再分药。一次我洗了手正要拿药，老人的女儿问：“你洗手了吗？”

当时我就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心里都颤了一下。我有脾气，只答：“洗了。”

她又问我：“你知道这些药的名字都叫什么吗？”

我说：“十几盒药名，哪天什么时候，吃几顿，我都能给你背出来，姐，你相信不相信？”

她便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她看我倒药，又说：“你怎么不那样拿呀？”

我说：“姐，是不是出门的时候你还要看看我先迈左腿还是右腿呢？你要求的是我把药拿好，但你不能要求我怎么拿。”

我就一句话，她不吱声了。

为了和雇主搞好关系，有时候我也借助别人。

一次我从公司回到雇主家，跟家里老太太说：“我们到公司挺热闹，平时都散在各家各户，见了面都交流，谁家老太太特难说话，谁家老太太连换了好几个人，谁家老人好说话，我们都知道。”

我就让我家老太太听呗，人总是要面子的。然后我反过来就说：“我跟姐妹们说，我家老人可好着呢，通情达理。”

还有一次，我跟老太太说公司一个老乡员工不干了，老太太问：“为啥呀？”我说：“那员工说，在雇主家不让吃饱，水果也没有。她在雇主家也没多大要求呀，每天最多就多吃一个馒头，多吃一碗米饭。这又不是串亲戚，这顿吃少了可以忍着，晚上回家就能吃饱，这是经常吃不饱。我这老乡说干不了了，雇主家太小气，她跟我说，‘别看咱们是农村出来的，咱们都比北京人大

方，原来北京人都这么小气’。”

老太太的儿子一次在医院动了个小手术，我买了一大把进口香蕉去看他。平时，我自己都买便宜的。我把香蕉给了老太太的儿媳，他们都挺感谢的。你主动热情些，有时候他们该刁难你的时候也就不会了。

老太太的小女儿来家里住，早晨总去厨房刷牙。我把台面擦得干干净净，她一刷牙，溅得哪儿都是。一次我就在她刷牙时，当着她的面，拽着抹布擦。以后她刷牙都注意了。

还有一次，她热中药。草药渣撒在台上一片。她看着我，自言自语地说：“哎呀，今天没倒好。”下一次她没撒，又跟我说：“小张，你看，我这次倒得好！”

有些事情，你的要求比她高，做得比她好，她就会注意了。时间长了，她不会小看你。

北京打工妹之家、地丁花剧社

成立于1996年4月7日的打工妹之家，是中国第一家为农村走进城市寻找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机构，隶属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作为中国最早服务于打工妹的NGO组织，打工妹之家始终将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并在努力尝试建立农村妇女参与城市化发展的组织模式。其将维护打工妹群体的合法权益，改善打工妹群体的生存质量，增强打工妹群体的发展能力，作为工作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打工妹之家开展了多种活动。其中包括家政工文艺表演队。地丁花剧社便脱胎于这支表演队，它的命名来源于《地丁花之歌》，于2011年10月成立。

地丁花剧社致力于创作展示家政工生活和工作的剧目，让社会中更多的人了解她们的“劳动、尊严与梦想”，让家政工像其他工人一样体面地劳动。

北京市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

北京市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是一家在东城区民政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为北京市东城区社会组织指导服务中心。

该服务社主要面向东城区14个街道，提供居家养老、月嫂、育婴、保洁等服务，旨在为政府和社会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同时为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及农村妇女提供在京就业的岗位。



地丁花剧社演出《我的劳动尊严与梦想》

摄影：北京打工妹之家

西安篇



21世纪初，下岗潮冲击古城西安。在这个闻名世界的辉煌古都、改革开放前的工业重镇，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引以为傲的工人身份。

这一大批被解放的，抑或是被放逐的劳动力群体，唯有拖着惊慌的心和急需经济维持的家庭，茫然无措地在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的转向大潮中，寻找出路。这其中，不少家庭的女主人涌进了门槛较低的家政行业。

被社会主义工厂培养出的团结思想和职业意识，依然存留在这群新生的家政女工的血液里。即使做家政的首要目的是维持生计，她们也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将这份工作看成一份值得认真对待的个人事业，并努力希望从中获得职业成就感和自豪感，实现自身的价值。

十几年前，家政工身处的社会环境并不宽容。对职业本身的歧视、对家政工的不够尊重、行业规则的无序，都给了他们许多压力。很多家政工的家人也一度无法理解并接受这个事实。

2002年，一个旨在建立家政工支持网络的项目启动，不少家政工因此而聚集、相识。经过逐步发展，草根小组得以建立。

第一期项目的结果是促成了2004年西安市家政工工会委员会的成立。第二期项目支持了工会的进一步发展，至2006年下半年项目主要活动结束。

工会团结了许多家政姐妹，即使离开工厂，她们也依然需要集体的温暖。

对于本篇访谈中的五位家政大姐而言，工会曾几乎意味着一切。

王葳，现任工会负责人，也是伴随工会成长时间最长的几

位成员之一。她依然记得，工会刚成立时，她们只能借用其他组织的饭厅，每周日接待家政工，尽一己之力给家政工提供法律、权益以及情感上的帮助。

如今，一晃十年过去，在这个大家庭中，新人来旧人走，已经变了许多模样。然而，对于依然坚守在工会的老姐妹而言，姐妹的情谊，已深厚如亲情，甚至胜过亲情。

“工会就是我们的一种情感寄托，”王葳说。

这些人到中年，甚至已经拿着退休工资的家政大姐们，靠着女性特有的坚韧、善良与奉献精神，为自己、身边的姐妹，也为后来人，从无到有，扎扎实实地经营起了一个叫作“家”的温暖港湾。



西安家政工工会会员外出活动

摄影：西安家政工工会

大年初三的夜晚，我梦见我在一个废墟上走，张教授在后面到处找我。我一下就把眼睛睁开了，心想，哎呀，老头儿这次出不了医院了。再一想，人家俩儿子都在医院，不用我操心。结果到了大年初五，两个儿子刚走，呼阿姨电话就过来了：“小芸呀，你叔不行了……”

梁姐的人生

梁芸祖籍浙江，在西安出生并长大。她喜欢爽朗地笑，总说自己是个能给别人带去快乐的人。可谈及人生最艰难时曾想从七楼跳下来的那种痛苦，仍会泪流，她也毫不掩饰。

也许是命运给梁芸的安排太过深刻，才让她在回望时，能够把自己经历过的那些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以一种置身事外的说书人的态度与腔调，缓缓道来。

家政是什么

我原在西安市国棉厂工作，1993年因为身体不好离开。1994年，工厂工人开始大量下岗。离开国棉厂时，我才25岁，可在工厂已经干了六年。下岗后，我没有直接做家政，而是在家伺候常年卧床不起的婆婆，直到2002年。中间这几年，全靠老公在外面跑。

那段时间真难，难到孩子上学需要200块钱，我都要发愁。愁得我呀，看到七层楼的楼顶，我就在想：从那上面跳下来是啥感觉？真是很愁很愁。

那时，我老公跟我说：“碰上合适的，你就走吧。”

他家太穷了，我家一直不同意。我的孩子都快上学了，我妈还在劝我离婚。我家条件相对好些，自从到了他家，我才开始在经济上发愁。直到现在我家还是瞧不起他，他现在已经不去我（娘）家了。可他人很好。我俩恋爱谈了四年，结婚二十七年，有一个女儿。

到了2002年，隔壁嫂子说她有朋友在做家政。那时候对家政不了解，只听说是给别人做饭。我就想，我是家庭妇女，做饭也可以。但如何进入这一行，还真不知道。

所以我就去参加了省总工会组织的下岗职工免费培训。培训涉及职业道德、职业技能、社交礼仪等方面。培训完，就有人给介绍活儿了。我到雇主家看了看，好像不是我能接受的。

为什么？因为要住家。雇主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对我还是挺尊重的。但咱在工厂干惯了，都是到点来到点走，要住家，我实在接受不了。

后来，和我一起培训的一个人说，她朋友家里需要人，早上来晚上走。我说那行，我去试一试。

刚开始，雇主一家老小对我挺满意。但他家小孩老生病，总需要住院。孩子一住院，我就一个人在他家里。我就纳闷了，你家老小全去医院，也不给我钥匙，我待在你家干啥呀？你家不需要人就让我回家呗。

过了段时间，我实在受不了，提出来说不干了。雇主不太高兴，因为他们觉得找个合适的人不容易，尤其是在吃上能和他们配合的，所以就挽留我。但他们挽留的语气有些强势，我也接受不了。最后，我还是回家了。

在家待了三个月，有人推荐我去市总工会再问问工作机会，我就去了。

市总工会问我参加过培训没，我说参加过省总（工会）的，然后把证件给他们看。市总（工会）的人看后，直接问我想找啥样的活儿，我说最好是到了（雇主家后）我把活儿一干完，屁股一拍就走人的。于是，他们就给我介绍了钟点工。这正好合了我的性子。

就这样，我到了高总家。高总人很好，不多话。我跟他家人性子投缘，很好处。干了一个月后，高总说，如果我有空余时间，就到他公司再干一份。我答应了，挺高兴的。

那段时间我慢慢适应了家政工作。这种处于单位和家庭之间相交的状态，我特别容易接受。又干了一段时间，高总问我：“如果你家里能安排开的话，你能不能把我家的时间变一变？”我问：“咋变？”他说：“你帮我接孩子，带打扫卫生和做饭。”

这下，我才彻彻底底走入了家政行业。

张教授的最后时光

2009年4月，我老公出了车祸，对方逃逸。

我老公是晚上下班时被车撞的，伤得很厉害，重度脑损伤，那简直就是要了命了。他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多星期，做了开颅手术，捡了条命回来。

为照顾老公，我歇了两个月。从这件事之后到现在，我只做两家。其间，再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给我推荐了一家雇主。主任说那家老头儿脾气太坏了，谁去都不行，想让我去试试。结果我去了，觉得老头儿脾气特好，跟我特投缘。我就在他家一直干，直到把老人送走。

老人姓张，是大学退休教授。他很有意思，总跟老伴儿发脾气，但他看我进了屋就笑呵呵，觉得特喜庆。

有一天，张教授跟我说：“小芸呀，我想吃羊排。”我说：“没问题，我去买。”

他老伴儿出门买菜了，我就对他说：“你可乖乖坐在这儿啊，别乱动，万一把你摔着可不好。”他说：“我在这儿坐着不动，你去买羊排，给咱炖羊排吃。”

我骑着自行车，去市场买了羊排回来炖。等炖好吃上，他才说：“我都没给你钱，你就买回来了。你不怕我不给你钱。”我说：“大不了我请您吃顿羊排嘛！”

从那以后，他的态度就彻底变了，整天拉着我长啊短啊、短啊长啊地说。

早上我一去，他先拉着我说话。我干活儿也要快一点，边干边跟他拉家常。我活儿干完了，就得坐到他跟前，给他按腿接手，他就给我讲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吃完饭我让他睡觉，他非要跟我叨叨完才肯睡。天天如此。

后来，张教授住院了。因为急性阑尾炎动了个手术，结果所有的病都爆发了。每次我一去医院，他就不让我走。

他说：“小芸，你扶我到窗户那儿。”

我问：“扶你到窗户那儿干啥？”

“跳下去。”

“你跳下去了，是不是把我也拽下去。”

“我不拽你。”

“我把你扶到那儿，是不是跟拽我一样？”

“……那好吧。”

张教授住院时脾气不好，谁来骂谁，唯独我，他不骂。医生都问：“你是他女子（方言，女儿）哈？”我说：“嗯。”没必要跟别人解释那么多。

张教授76岁了，住院时只有我在跟前（方言，身边）。我又要做饭又要照顾他，他老伴儿呼阿姨就让我再找一个人到医院看护。我答应下来，找了三个，都被张教授一个一个骂走了。最后找的一个还好，他还算接受，但就是不让别人碰。

每次都是我去给张教授洗脸洗头。老头儿躺在床上不能动，他还有心脏衰竭、糖尿病、高血压，头不好洗。最后我说：“叔，是这吧，我给你刮个光光头，你当和尚。”

他说：“嗯，好。”

我就拿他的刮胡刀给他刮了个光头。刮完以后，我对他说：“叔，你摸一摸，你现在成老和尚了，可以

出家了。”

他又是：“嗯，好。”

只要在我跟前，他什么都是“嗯，好”。护士们都对我说，你要是一直都在这儿就好了，要不老头儿光骂人，光发脾气。

每次离开医院时，我都跟张教授说：“叔，你别再骂人了，你骂人，人家吓得都离你远远的，就没人照顾你了。”

他还是说：“嗯，好。”

张教授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他和呼阿姨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厦门，一个在日本，都没办法照顾他。呼阿姨有任何事情，都是给我一个电话，“小芸呀，你叔又咋咋咋”，我就往过（他们家）跑，不分任何时间，除了我上班。那段时间，也还是原来每月280元的老工资。

我就想，老人两个儿子都不在跟前，人家有事肯定是找咱。

直到过年，老人的儿子回来，我在家歇了五天。中间我还去过，但那不算上班，就是去探望老人。

大年初三的夜晚，我梦见我在一个废墟上走，张教授在后面到处找我。我一下就把眼睛睁开了，心想，哎呀，老头儿这次出不了医院了。再一想，人家俩儿子都在医院，不用我操心。结果到了大年初五，两个儿子刚走，呼阿姨电话就过来了：“小芸呀，你叔不行了……”

我跟呼阿姨说：“你把我叔的衣服拿医院去。”然后我赶紧骑了自行车去医院。那段时间我也穷，只能骑个破自行车。

我到了医院，呼阿姨也到了，还有看护和张教授单位的人。大夫一看见我，就说老人不行了。我扭头跟我给她找的看护说：“你打盆热水去。”等热水到了，我就拿毛巾给老爷子全身一擦，从头到脚，然后把衣服穿上。其他人全都站一边儿看。

旁边大夫和护士都说：“呀，你看你这个当女儿的，心真细。”这下才有人说：“这是他家帮忙的，不是他女儿。”护士长惊讶地说：“原来你不是呀！”

那几天我没回家，一直陪着呼阿姨，她一个人害怕。等两个儿子都回来了，（遗体）火化那天，我说我不去火葬场了，老太太和儿子们都不愿意，都说“你去送你叔吧，要不你叔还得找你”。我是觉得我这个身份去不合适，大儿子就说：“你就是我们家人，有啥不合适的？”

这才非把我接过去，把老人送走。

等到回来，二儿子问我：“你家能放开不？要是能放开的话，你就和我妈一起到我那儿去。”我说：“不行，我家里也有老人，我公公80多了，我也有孩子，去不成。”

离开时，呼阿姨给我1500块钱，硬塞到我手上。我想她家刚去人（有人过世），钱花得也多，我就不收。呼阿姨说：“看护我也给了，也少不了你这份。”

我才拿上，说：“不过阿姨，这个月工资你就不要给我了。”

呼阿姨说：“嗯，行！行！行！”

我这才离开他家。然后去了另一家帮带孩子，一带就是六年，直到她家里生二胎我帮她找了月嫂。

你让我跳楼我也跳楼吗？

我曾经很生气地离开过一个雇主家，在他家时间很短，也就两三个月。雇主是做生意的小两口，都30出头，两个人在外租房住，女的怀孕了，是头胎。

这小两口，每顿饭十个菜，就两个人吃，吃不了就倒掉。所以我就把菜量减少，花样增多，每次一大桌子菜，顿顿如此。

这个，我也没啥说的，我这人本身也爱炒菜。可我为啥离开呢？是因为另一个家政工。

女雇主怀孕了，需要找月嫂每个周末来，我是一周干五天。找来月嫂后，女雇主在我面前商讨怎么用她，其间他们对月嫂的用词特别不尊重，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花了这么多钱雇她，随时叫她，她随时就得到跟前来。

我就不同意了。我说你们要保证人家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否则人家哪有精力来帮你。女雇主反驳了我。我当时没说啥，但心里很膈应。没过几天，我就跟女主人说：“劳动局有个下岗技能培训班，我想去参加烹饪培训，你们另找人吧。”

我跟男雇主说了两回，他都不放我，说让我先在这儿干，等能安排开时间了，他掏钱安排我去参加培训。我说：“不用了，我们有这种免费培训，用不着你掏钱。”女主人就接着说：“阿姨，你都做得这么好了，用得着去培训吗？”

我看他们这样强行挽留，也不好意思走，就一直干着。

直到有一天，男雇主不在家，女雇主让我去把窗户擦一下。当时是夏天，下午的太阳特别晒，我就说，明早一来我把玻璃先擦了，这个时间热，太阳把玻璃晒得太热不好擦。

女主人就直接来了句：“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我说：“你让我跳楼我也跳楼吗？”

她一愣。

我接着说：“是这，咱俩性格也不合，你把钱给我结了，我走。”

她一下子后悔了，给我认错，让我留下。但我坚持，反正早就有了走的心。她也沒辦法，给我把账结了。

回来以后，推荐工作的张主任给我打电话问：“那家说你好得很，你为什么要走？”

我就把情况跟张主任一说。张主任听完说：“走就走了吧，再给你安排一家！”

十年一涨薪

张教授的遗孀呼阿姨到厦门的小儿子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住不惯又跑回西安。一回来，她就给我打电话。后来她又去日本，回来以后还是给我打电话。我一过去看她，就给她帮忙搞搞卫生，不但没收过钱，每次去还给老太太提礼物呢。

还有一户干的时间不长，我离开以后，他家还时不时打电话让我去。但是这家让我有点儿不那么痛快。他们喊我去搞卫生，都不给钱的。我也不好意思说，磨不开面子。

我这人做任何事情都不沾别人光，穷命吧，就图个问心无愧。

我离开的这些人，每年还都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从2002年开始做家政到现在，最长的（一户干）十年，然后是六年、五年、三年，都不短。

做了十年这一家，工资只涨过一回。他家不规定时间，我把活儿干完就行。刚开始去的时候工资是1000元，干了六七年，我实在忍不住了，才说了涨工资。

之前逢年过节，他家就给我发红包或礼品，我孩子开学也给个1000，这些都没按工资走。但这种方式给钱，咱是要承人情的，和涨工资不一样。我就提出来：“我们这行业现在工资都往上走，你是不是也给我把工资涨一涨？”

雇主说：“好。看你喜欢涨工资，还是我按过节的形式给你。”我说：“你还是给我涨工资吧。我们现在行业都是干六天拿1500，你给我1400吧。”

这个工资数额一直到现在。但那次涨工资后两年，过年过节雇主就不给我红包了，也不太给我东西。最近两年又开始给我了，但给得就比较少，或者买件衣服，我还是不吭声。我也不再要求涨工资了。我女儿今年6月份毕业，她一毕业，我就退休。

不再笑

我老公出车祸那段时间，工会的姐妹们对我的支持非常大，她们帮我跑救助，经常打电话给我。我挺感谢大家的，因为那段时间是我最难最难的时候。

当时我还在两户人家干着。有一户需要接孩子，我就说你赶紧找人吧，雇主还说要带孩子来医院看我们，我说医院这环境对孩子不好，不要来了。两户一直等着我，没扣我一分钱工资，还另外多给。

我心里清楚，这都是人心换人心。我本来是四个小时干完就走，但他们一出差就把钥匙和家都交给我了。我就几乎成了住家的，给孩子做早饭，送孩子上学，从不提钱的事。

我老公住了五十多天医院，花了6万多，几乎都是自费，最后只报销了2万多。孩子的老师提议呼吁社会和学校对我家进行救助，我考虑到孩子有自己的圈子和自尊，就没有同意。说实话，这是我老公被救过来了，没救过来，我也就走了。

这次车祸后，我老公性情大变。他原来脾气很好，现在时不时就暴怒一场。所有的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包括对我，都持怀疑态度。他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不满的一种宣泄，但他不冲着我冲谁啊，毕竟多年夫妻，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我就不顾之前的感情了。他再发脾气，一个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

出事以前，家里我什么都不用管。我老公会把家里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甚至包括手机充电这种事。他要是出远门，还跟女儿打招呼说“把你妈照顾好”。但从他出事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得我操心。不少人都说，这是以前你老公对你太好了，现在你该还债了。

我有颈椎骨刺、腰椎间盘突出、心脏病。也不知道是不是干家政干的，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毛病就都出来了。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我半个头都疼。

有一回坐着跟姐妹们聊天，我突然觉得心脏开始突突地跳，突得我可难受了，我人就开始发软发冷，就往座上靠。对面姐妹问：“你咋了？”我说：“我好难受。”她妈是大夫，有经验，她说：“你先趴那儿别动。”

过了一会儿，我好了一点，她说：“好，我送你上医院。”

一去医院，就住了五十多天。怎么回事？压根儿没查出来。天天查，也没查出来。

我去的是职工医院，大夫说不行去大医院吧。我这人皮实，没去。

其实，一方面是条件不允许；另一方面，我老公出事后，我走到医院门口心里就突突，就难受。所以我从不到医院去。我家附近诊所的大夫给我开了复方丹参滴丸，不舒服我就吃药，把药往舌头底下一含，一下就过来了。

有一次很严重，我出门给孩子买鞋。出门前跟我老公有点儿生气。挑鞋的时候我突然就心脏不舒服，直接趴到了鞋摊上，把周围人吓得不轻。卖鞋的问我咋样，我就摆了摆手。

没有人动我。过了一会儿，我缓过来了，自己去医院，把大夫吓一跳。大夫说我这种情况可不敢再发生了，太可怕了。大夫对我说：“根据你描述的情况，你当时心率接近300。你趴在那儿，是因为你腿上一点儿劲都没有了，再稍微严重一点儿，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人在遇到大难时，才能很清晰地去感触周围的一切。

我这人皮实，多苦多累，从来没当回事。流眼泪都是遇到比较大的灾难。我做了十年这家的雇主对我最了解。我这十年的历程，她一直看着，说我变了。

我刚到她家时，她都看着我乐，说整天见不着你发愁，进门哼歌出门哼歌，干着活儿都哼着唱着，家里可热闹，也不会吵着别人，让人感觉很轻松。

自从我老公出事以后，她就说我：“你这脸上的笑都没了？”

的确，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我一个人的时候，是不笑的。以前我从来不碰烟，但自从我老公出事以后，偶尔我还抽烟，但我不让我老公看见。

这不是经济上的压力，是精神上的压力。我以前啥事都不往心里头去，大大咧咧糊涂惯了。除了洗衣服做饭，连买菜都不是我的事。但是现在都成我的事了。

我不铺张浪费，但也不能手头上特别紧。我这人好吃、不好穿。我不是那种爱吃高档次饮食的人，我爱吃风味小吃和杂食，如果我买完这些，还要抠一抠剩下的买菜钱的话，我就觉得压力有点大了。

我老公原来是电工，现在在配电室值班，我俩一年交两万多元的养老保险。我们不求多，只求稳，细水长流，只愿保持这个状态不要出任何状况，直到我退休。



西安家政工工会组织编织学习活动

摄影：西安家政工工会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我就是那种没出息的人。人家都说你这日子过得是个啥嘛，但我也不知道该咋过。我想走出一大步，但觉得不好。原地这样吧，也是个没头。

出路在哪里

也许，有些人的生活，除了出于生存本能的挣扎，真的可以只剩下无望。

“她老公一到过年就打她。有一次过年又打，她和娃藏在门背后不敢出来……”所有家政姐妹当中，让工会主席王葳最不知如何是好的，是刘亚红。

“她的日子就好像没盼头似的，”王葳说。

刘亚红有着极强的自尊心，总把自己包裹得很严，不愿与人提及自家的事情。

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刘亚红还是婆家、娘家和自家几乎唯一的经济支柱。她离家出走，也想过一切可能的解脱方式，包括带着孩子一起自杀。

然而，每一段痛苦纠结的结尾，刘亚红都会选择再次回到那个被王葳描述为“一贫如洗、可怕得很”的家里，牵起一双子女的手，继续“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的挣扎。

患精神分裂症的丈夫

刘亚红农村出身，嫁到城市。结婚时，对于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家庭生活，20岁刚出头的她全无概念。

婚后，她辞去了注射室的护理工作。一对龙凤胎出生后，她就在家附近的社区开起了商店。日子一度过得还算平稳。

然而，熟人多，总有欠账。刘亚红的丈夫四处求人要钱，结果被打，一气之下，得了精神分裂症。

他从2003年开始得这个病，一下就病重得很。一发病，他就在家摔打东西，现在我家没一样好东西。四处（给他）看病也看不好。不知道咋地，他一会儿就不行（犯病）了，没法跟他沟通。

刘亚红下班回家，丈夫就拿过她的包来翻。

他说要攒毛毛钱（一角钱和五角钱），攒了一蛇皮袋，其实一共没多少钱。他还胡说，说他给我挣钱，我给别人挣钱，叫楼上都把咱控制了。

他就胡说，说自己是冶金厂的法人代表，不用交水费、煤气费，啥都不交！

刘亚红说，丈夫犯病时还会对两个孩子说：

不用上学了，到时候继承爸爸的资产，爸爸有几个亿呢。

孩子问妈妈“一个亿是多少”，刘亚红说：“你爸胡说呢，别听他的。”

不能刺激他。有时候我窝囊得很，老公当着我的面使劲骂我，我不敢吭声。我心里都快气炸了，也不敢吭声。只要我一吭声，这就完了，他就更大声骂，还动手打人。

之前他养狗，社区说不让养，狗那么大，出来吓人。我就跟他说，咱把狗处理了吧，要不咱把狗拉回农村我家去养。为这事儿，他就跟我吵起来了。我本来拌了一盆凉菜要吃，他在那儿嘟囔嘟囔。我也不知道咋，一股火上来，就拿菜盆扣他头上了。他拿了个盘子在我头上打了一下。当时我都不知道哪块儿被他打坏了，满脸流血，把娃吓得呀……

后来，刘亚红的伤口缝了针。也是从那以后，她就不再跟老公正面说话了。

能不招他就不招，能不理他就不理。孩子们也一样，怕他。

有时候，他使劲骂使劲喊，我就说：“你别喊了，让人再睡会儿吧，明早娃还要上学，我还要干活儿去呢。”他说行，答应得好好的。可我刚躺床上，他那边又喊开了，好像是无意识地控制不了自己。

一犯病，家里其他人只能随他去。十几年来，楼上楼下一直有意见，可邻居们同样没办法。

社区曾让刘亚红把丈夫送去住院。可住院出院反复几次，刘亚红还是选择了把丈夫安置在家里。

住一两个月医院回来，他就更不像个人了。别人都说，是在医院吃的那几种药把人拿住了，人就狂不起来。他只要从医院回来，看人就是呆的，眼睛也是那种瞪着的样子，走路抬不起来腿，几次都绊倒了。原来还想着住几个月医院能好，后来看，也没用。

我也心软，看他被医院拉去，怪可怜的。有一次，他在精神病院被人打了，打得可厉害。后来我就想，只要他在家里不太过分，就不去医院了。住院也好不了，还掏好多钱。虽然社区给出一半，但对我家来说还是好多钱呢。反正他在家我们也不刺激他，他想骂就骂。

丈夫在家，刘亚红就需要承担更多。

王葳记得，一次，刘亚红的丈夫突然说要出去卖菜，刘亚红便给他买了个手推三轮车。不久，三轮车被丈夫弄丢了。刘亚红到处筹钱，又换了个电动车。结果到了年关，丈夫犯病，把电动车砸了。菜没卖出去，反而被弄得满屋都是。

王葳说：“她老公一到过年就爱打她，往死里打，自己妈他也打，打得全家没地方住。估计是他看见别人家红红火火过年，受刺激了吧。”

这件事，刘亚红自己没有提及，只是说：

我老公没法沟通，只能他想干啥干啥，我也不管他。他妈也管不了他。

只要能干得动，我就一直干

当时做家政，我是想着，家里俩娃，还那么多事，时间上能自由一点儿（就好）。户主对我也没有时间约束，只要干完活儿，我就能走。

刘亚红的丈夫原是工人，得病后丧失了工作能力，家庭负担一下子全部落在刘亚红一人身上。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忙忙碌碌，干活儿挣钱。

家里，我一天也照顾不好

刚开始我在物业公司干，打扫了一年楼道。后来住户就说，要不然你来我家干吧。久而久之，户主之间互相介绍，我就越干活儿越多了。最开始我自卑，老觉得不如人。后来发现周围人都挺好，从来不用那种眼光看我，慢慢就习惯了。我只打扫卫生，不操别的心。

现在，刘亚红固定做四家的钟点保洁。其中一家是公司的三层办公室。

我先是在户主家里干，户主有公司，就说把他公司的保洁也带上吧，稳定一点儿，也不用我来回跑了。

另外两户都是家庭，户主都在国外，刘亚红拿着两家钥匙，一周打扫一次，已如此维持了十年。

刘亚红在自家社区交着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做家政的工资按兼职计算，一个月下来，工资总计不到3000元。每周她休息两天——周五下午、周六一天和周日下午，时间连不起来。

今年我干不动了，查出好多病。我眼睛不好，越着急越看不清楚，尤其左眼，可我还就爱着急。去医院查，是静脉旁脉络膜萎缩、眼底脉络膜萎缩。前段时间公司体检，又查出子宫肌瘤和胆囊息肉，医生说我要定期复查。这些病，查出来了，人心里就会老是想。

然而她并不想着结束这份工作。

我想着，能干就干，至于干多久，我也不知道。现在别的工作也不好干，家政我也干顺了，户主也都挺好的。只要能干得动，我就一直干，不管50岁还是60岁。

带娃干活儿

第一次带娃出来干活儿，刘亚红也记不清具体时间了。

那是几年前，别人介绍我干一份全面清洁的工作，说一天干完给我450块钱。我想着，没多少活儿，主要是玻璃，地面才装修完，干干净净。我就想把娃带去，

多挣点儿钱，不用再另付钱叫别人了。

清洁工作从早上九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半。从未如此辛苦过的娃们累坏了，干完活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中午，我们就在外面吃盒饭。盒饭里有排骨，把娃高兴得（不行）。我娃可怜，只要给吃饱就行。那次把娃累坏了，他们也觉得我不容易。后来，只要一叫他们干活儿，我就对他们说：“中午想吃啥给你买啥。”

从那以后，每逢周日或暑假，孩子们便时不时帮母亲做工。

公司的三层比较大，我一个人得干四五个小时。娃们15岁了，也可以帮我，有时我就让他们过来帮忙收收垃圾、扫扫地。要不然一天下来我特别累。

刘亚红的一双儿女今年上初三。毕业在即，她突然接到了学校班主任的电话。

“娃学习不好，啥时候去技校啊？”班主任问。

“最起码得过完年后再跟着技校的招生时间走吧，”刘亚红答。

刘亚红知道，老师是想把娃往外赶，“嫌影响她班成绩”。

自己没把孩子管好，但又不知如何管，让刘亚红有一种有劲使不上的焦虑。

娃小时候我也没管上，整天在外面干活儿。我老公在家乱喊乱骂，娃害怕，写不了作业，不能安心学习。之前我想，我辛苦一点好好干，娃不管哪一个，好好学，考个好学校，有前途有出息。现在看来，都不行。娃不争气，学习一个不如一个，女孩儿还比男孩儿强一点儿。高中肯定都考不上了，就想着让他们上个技校。

啥时候是个头

对于未来，刘亚红选择不去想。她养成了一个习惯，任何事情自己做主，无论好坏对错，因为“从来没人商量”。

刘亚红常回农村的娘家，过去数年，她每个月都要回去两次。即使经济再紧张，每次回家，她也不会空着手。一方面，她是一双儿女的依靠；另一方面，她也是自己父母的唯一依靠。

刘亚红本是兄妹二人，然而哥哥早逝，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侄子被爷爷奶奶带大，但大部分费用都由刘亚红承担。她低着头说：

自家是那样，娘家也是这样，我就一直这么干了好多年。

刘亚红家的情况，她爸妈和老家的亲戚们都知道。本着农村人的观念，她的爸爸始终认为，无论如何，现在都是亲的，再嫁一家，就不好说了。

确实，最起码现在家庭没啥复杂的，我婆家也没有亲戚之间斗来斗去这些事。再走一家，要是人家有心眼儿，我这人想问题又很直，处理不好亲戚之间的事情。现在家里人（丈夫）虽然不正常，可都是一条心。

就这样，刘亚红撑着两个家庭，虽勉强生存，但始终没有让家散了。现在，17岁的侄子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娘家那边的经济负担少了一些。

今年我回娘家回得少，也不太管家里经济了。我爸前几天还打电话，嫌我不回去。哎，其实这样两边跑，我累得很。

刘亚红的公公已经去世，婆婆身体不好，每月的退休工资，都给儿子拿了去。

我婆婆20号发工资，她娘俩那两天就使劲买东西，有用的没用的都买，剩下半个月没啥钱了，就得我买菜回去做饭。不怕你们笑话，我家现在就是各管各，他俩我不管，我就管俩娃，一天傻乎乎的，啥事也不想，就打扫卫生，回家。

在刘亚红眼中，婆婆是个老实人，但婆婆也拿自己儿子没办法。

她拿多少退休金我都不知道，大概2000左右吧，我不太管。婆婆最开始还给家买菜、贴补生活费，后来就都给她儿子了。反正家里有菜，我就不买，没有了我就买。

钱是存不下的。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户主和朋友资助，除非必需才花钱购买。

刘亚红生得清秀，瘦小。乍一看，根本不像已经42岁的人。她不是没想过离婚再嫁，但软肋是两个孩子。最绝望的时候，她想过自杀，舍不得孩子，那就索性带上孩子一起走。

我要朝前走一步，俩娃咋办？不可能有（男）人能接受俩娃的。我要是不管娃吧，他们就彻底学坏了。所以我就想，不管咋样，这是一家人，我老公虽然疯疯癫癫，但他对娃咋样（好），我不用操这份心。

最后，刘亚红这样发问：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我就是那种没出息的人。我老想着，现在还能挣点儿钱，也不需要男人养活。人家都说你这日子过得是个啥嘛，但我也不知道该咋过。我想走出一步，但觉得不好。原地这样吧，也是没个头。谁能给我建议一下吗？

我把所学的全部知识用在孩子身上，心里可高兴，再苦再累我也觉得是种快乐。同时，我认为自己在做善事，因为孩子好了，家庭就快乐。自己挣到收入心情好，也给别人家庭带来快乐。

把家政当成事业

十年前，安翠萍从高压、高工作强度的工厂下岗，机缘巧合，入了家政一行。那时，这个选择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可在她眼里，家政工作是一种持续的技能培训，也是一份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

靠着这个信念，她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坚持走到了今天。在收获了职业自豪感的同时，她也慢慢得到了全家人的认可与支持。

父母的极力反对

2006年年底，因为工厂不景气，工作也不开心，安翠萍选择了离开。刚离开厂子时，她心里很难受，对于接下来的生活也茫然无措。看到马路边有家卖十字绣的小店，她便跑进去应聘做了营业员。结果刚做一个月，因为收了假钞，她

就被辞退了。

楼上邻居对她说：“不行，你给人家带个孩子吧。”

我自己家孩子都不想带，给别人带更不愿意。

可安翠萍又一想，总得有活儿干，挣钱供孩子上学，便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份工作。

见到了雇主，安翠萍坦言自己以前从没干过家政，雇主对她说：“不要紧，咱们试试吧。”

就这样，安翠萍第一次以工作的方式，走进了陌生人的家。

我一进门，看见他家小女孩到处跑，可爱的小女孩。可我不知道该咋弄。我爱看书，看见他家摆了好多童书，就说：“维维，阿姨给你念书吧。”孩子不理我，就跑，因为不熟嘛。我就自己开始念。念着念着，她过来摸摸我的手，看着我。从这时，我开始跟孩子有了交流。

雇主做直销，平时很忙，看到安翠萍和孩子处得不错，便请求她过来住两个晚上陪陪孩子。安翠萍答应了。第三天早上，她回到自己家。

一进门，母亲就问她：“干啥去了？”

人家让我带小孩儿。

啊，你翅膀长硬了，没事干去给别人带孩子了！

安翠萍的父亲是大学老师，女儿出去“做保姆”，他总觉得自己脸上没面子。所以，两位老人都极力反对。

我当时哭了，心里可难受，可委屈。我说我靠两手挣钱，这有啥嘛。再者说，人家挺信任我的，这种信任让我觉得自己有用，心里特别高兴。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安翠萍退出。她接着照顾维维。一次，听说幼儿园要举办讲故事比赛，她便给维维讲了几个故事。小女孩特别有灵性，拿了个特等奖回来。

这个活动是我去参加的，孩子爸妈都没去。特等奖的奖品是一个海绵宝宝书包，还有奖状和证书。得了奖的维维开心得满院跑，孩子妈妈得知这个好消息也非常开心，直说“这是我们孩子人生中第一个奖”。

从那天开始，小维维每天背着海绵宝宝书包去上学。安翠萍也开始从家政工作中，持续地收获成就感。

不断进阶

深入体验后，安翠萍觉得家政行业很好，可以当成事业去做。听说这行还有培训和考证，她便参加了西安市总工会的家政培训。

每次培训我都早早去，坐在最前头，听课、记笔记可认真。

那次培训前，安翠萍带过一个2岁的孩子，孩子生病去医院的经历，让她明白自己迫切需要学习专业知识，才能更好地胜任这份工作。

市总工会培训后，她又参加了高级育婴师的培训。

老师说必须大专生才能参加，我正好大专毕业。参加培训的都是20多岁的小姑娘。我已经40多岁了。参加完培训我才知道，这个行业特别宽广，涵盖了孩子早期教育、心理生理（教育）等多方面。

安翠萍将自己的家政事业锁定在育婴师上。

育婴师包括0到3岁婴幼儿的教育和3岁以后的心理行为教育。孩子在3岁以前是定性期，很多生活习惯3岁就已经形成了。

我把所学的全部知识用在孩子身上，心里可高兴，再苦再累我也觉得是种快乐。同时，我认为自己在做善事，因为孩子好了，家庭就快乐。自己挣到收入心情好，也给别人家庭带来快乐。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能积累经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产妇的体质和性格也不一样，每个家庭也不一样，有时候看到别人家里的事情，我也会反思如何处理自己家庭的事情。

安翠萍坦言，育婴师，尤其月嫂确实累，但她喜欢孩子，一看见孩子，就忘了累。

孩子出生十来天，我就跟他们说话，他们的眼神就会跟我对看，啊啊啊地交流。孩子二十几天时，我就买黑白卡片，把早教加进来。孩子是照相记忆，照片印在脑子里，过多少年之后也会记得。学龄前儿童的记忆力很强，这时给他们更多的教育，非常重要。

做月嫂需要连续工作一个月，虽然可以和雇主商量中间休息一到两天，但很多时候，都得一口气干到底。一个月8000元工资，看着蛮多，但身体特别累。安翠萍说：

这是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工作，孩子一哼我就起来了，有时还需要凌晨起床给产妇做饭。

有的客户看你工作会说“这有啥？看着可轻松”。等你一走，他们才能发现真的离不开你。他们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怎么做，看见孩子只是高兴。真正对孩子的爱要从心里表现出来，要用眼神、用动作去表达，用信息去沟通。

每做完一家，安翠萍都会告诉雇主：

我走了以后，不会不管你们孩子，如果孩子有什么

事，你们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还会帮助你们的。

这些年，她的电话号码，一直没敢变。

半夜被赶走

我是晚上十一点上的户。户主家住郊区，家里是个早产儿，不到四斤。之前的月嫂干了一天就走了。

刚到雇主家时，我没注意看孩子，等户主把被子掀开看，哎哟，孩子可瘦啊，皮包骨，腿就跟我大拇指一样，眼睛可大，屁股都是尖的。户主说孩子生下来二斤九两，不到四斤就出院了。他家本来不想请月嫂，但怕孩子活不了，还是请了。

我看着觉得孩子好可怜，就决定接下来。

每天晚上，我给孩子妈妈按摩、开奶，然后给孩子喂奶。出满月时，孩子长到六斤多，孩子妈妈和奶奶都可高兴了。

那段时间我可累。他家经济条件不好，但每天早晨都给我煮一个鸡蛋，想让我身体养好点，帮他们好好带孩子。我也挺感激，就用心照顾孩子，每天给孩子擦腋窝、擦脸擦脚。

可就在下户的前几天，发生了一件让我想不通的事。

一天晚上，我洗完澡出来打了个喷嚏，孩子妈妈说：“呀，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我说：“没有啥吧。”她接着说：“那是这，我怕你传染，我们孩子小，你回家吧。”

我给公司打电话，公司让我听客户的。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跟孩子妈妈说：“你送我打个出租吧，或者让你爱人送我一下。”她说：“车库锁门了。”

我就一个人往外走，那是冬天，冷得很。我还是给男雇主打了电话，问他能不能送我回家，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孩子爸爸（男雇主）拒绝了我，说他刚回来把车放车库了。

我只能站在路边等出租车，好不容易拦到一辆。我跟司机说：“师傅我没带多少钱，我是做月嫂的，我回家。”司机问：“你咋这么晚回？”我说：“人家家里有事，让我回的。我先给你10块钱，到家我再给你拿钱。”

司机挺好，把我送回了家拉到小区门口，我回家拿钱给他，他还直说算了算了。

回家后，我真的就病倒了。我心里很难受，那么精心对人家，天那么晚了他们也不送我，把我送到出租车前也行啊。我病了两天，决定以后再也不去他家了。

结果公司打电话给我，说他家还要我，让我去。我当时就想不去了，人家把我赶出来，太受委屈了。但不知道为啥，可能是自己想孩子了吧，一想（下户）还剩四天，我就坐上车又回去了。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可难受。当时就只想着孩子那么小，万一他们弄不好咋办。

回去以后，孩子妈妈也跟我说了对不起，但我还是感觉可难受。我心想，你就不怕我晚上十一点一个人出去有危险啊？我也不是怪他们，就觉得挺伤心的。

我跟家政公司说了这件事，公司说客户这样他们也没办法，好像公司只管把人派去而已。我心里就更难受了，从那以后，我很少在家政公司干，都是靠别人介绍。

鲫鱼汤惹的祸

我之前有过一年接十单的记录，这就意味着我几乎全年无休。虽然累，但我喜欢去医院做陪护，从孕妇进产房我就过去，第一时间接触孩子，我能保证（孩子）没有病，孩子中间发生什么问题，我都能及时调整。

我最害怕孩子出生四五天后，孩子或产妇出现问题时，才让我上户的。我就遇到过这样一家。

我们入户就算工作日，我建议这家从（产妇）到了医院就让我上户，可雇主没让我去，觉得多花他家钱。我也无所谓了，只是建议而已。

结果孩子出生第三天，雇主家就打电话给我，让我赶紧去医院。之前我还特意跟产妇说了要注意什么，她只说知道知道，不想听我说下去。

结果咋回事？一生下来，家里人就给产妇喝鲫鱼汤，奶一下就结成了硬疙瘩。我跟她说过，刚生下来不能猛补，要吃得清淡，何况还是剖宫产。

孩子生下来刚好五斤，体重正常，但按现在来说偏轻。孩子半夜呼吸不行，手术时羊水进去了。不过这几天护理好了就没事。

我就可忙了，给产妇按摩，（奶）刚柔软又硬了，

孩子吸得又不快。我也可着急，所有按摩手段都用上了。

一天半夜里，我看孩子呼吸有点儿不好，就抱着孩子，和他奶奶一起去找护士。护士觉得我们吵了她，就说：“喊啥！喊啥！”我说：“你看这孩子的呼吸。”

“有啥看的！”护士态度有点恶劣。

我可难受可生气，孩子哭，奶奶哭，我也哭。这下把医生惊醒了，才过来看孩子。最后（医生）说是有积液，抱着拍拍就好了。那一晚我没睡好，就竖着抱着孩子睡，孩子不在我身边，我就不放心。

那孩子就是在医院那几天没弄好，后面把我拖得也很累。

出院后，又是一天半夜，我突然觉得孩子呼吸急促，就跟他家大人说：“赶紧把这孩子送医院吧。”孩子妈妈不让送，觉得孩子这么小，送医院折腾。

我说：“如果是正常的生理状况，我不会让你们去医院的。但这是病理状况，你们家必须拿个主意。”

最后，孩子爸爸开车去了医院。一检查是新生儿肺炎。最后孩子爸爸都说，如果不是及时送过去的话，孩子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几十分之一

我带过的孩子，现在没有一百也有几十个了。有时候客户说一两句让我不高兴的话，一看到孩子，我就忘了。

有一个孩子，让我挺自豪。这孩子2岁前在河南生

活，过来不适应这边水土，得了肺炎住院。孩子出院后，我就到了他家。

一天，孩子正玩着，突然就趴下了。我摸摸孩子，热了，体温计一量，三十八度五。我就赶紧去敲孩子爸的门，说孩子发烧了咱到医院看看。

孩子爸爸不想去，觉得刚出院又去不太好。我说：“你必须去，你不去，我就不干了，这孩子万一有啥事，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当时我说得很严重，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父母，心里很不舒服。

我把孩子父母说得无可奈何，（他们）开车带着孩子去了医院。医生说是孩子的肺炎没治好，现在严重了，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治好了也是慢性肺炎，伴随一生。

他爸这才重视了。那天晚上，我整夜陪着孩子在病床上打吊针，他爸看我累得很，就给我买了面吃。

孩子住院七天，我陪了孩子七天。他妈妈只下班来和孩子玩十分钟。不知道为啥，这对父母对孩子都很冷淡。有时候，我是觉得孩子父母对孩子不好，我才格外对孩子好。

对这个孩子，我也加入了早教。

孩子刚来时说河南话，说话还很粗，他父母也不教育。孩子出院后，因为身体弱没送幼儿园，我就一直在家带。我让孩子背《三字经》，孩子背得可好了。

十一二月的时候，我把孩子穿得暖暖和和的，带出去玩。碰见大人，我就教孩子喊“阿姨好”。一开始孩子不听，后来慢慢变成了见人主动打招呼，见到保洁员就喊“阿姨好”，见到保安就说“叔叔好”，最后都成了小区的小明星了。

我还和孩子在楼道里踢球，锻炼身体。从医院出来，孩子一直没再生病。我还教孩子认识小区地图、认字，不到一个月，小区的理发店、图书馆、小超市（招牌）上面的字，孩子全都认识了。

我们小区有湖，里面有天鹅，我经常带着孩子在那里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之后，孩子一到那儿就开心地主动背。

家人态度的转变

安翠萍是西安本地人，家中兄弟姐妹五人，她排行老四。在她的记忆中，家教严格，在大学教授经济学的父亲永远是工作第一，母亲没有正式工作，不停地做临时工挣钱养家。从小，她就能感觉到家庭的拮据，即使饿，她也从不跟母亲要吃的。

对于女儿做家政，安翠萍的父母一直反对，老人们觉得家政是下等仆人的工作。

2006年，国家发布六个新职业，其中包括育婴师和营养师。安翠萍一听说，便激动地拿着报纸去给父亲看。她对父亲说：

爸，你是大学教授，我承认你。可是我在家政工会也在培训我们的姐妹，哪天，说不定我会成为育婴教授。现在虽然还没有这个头衔，但我感觉，我培训其他姐妹的知识不比你少。

父亲说：“吹去吧，胡说啥呢。”

你别不信。随着社会发展，我们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个趋势。你虽然把我们养大了，可是你怎么养的？现在孩子跟过去孩子不一样了。

随着家政行业的正规化和她的执着与努力，安翠萍父母的态度逐渐从反对到肯定，再变成如今的支持。

我第一次把培训资格证的红本拿回家，我爸说：“啊！太好了，不错啊！”我可是在父亲的批评声中长大的啊！再后来，我又把家政服务员师资资格证拿回家，我爸看了可高兴。现在，我妈也觉得我能干，我姐姐的朋友还让我去带孩子呢。

安翠萍的婆婆对她做家政的态度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如今，早已心中默许。

一次因为做家政我婆婆跟我吵架，过后她还跟我说：“不该跟你生气，你也是为了这个家。”老人说这话，我心里就挺开心的了。通过我的努力，现在周围人都认可我了，我就有了价值。现在我还可以去上课，去教更多的姐妹们，这样的话不还是有价值的嘛！



西安家政工工会组织工会骨干学习活动

摄影：西安家政工工会

能进入这个家政行业的人，家庭条件都不好。我们这些人，走出来真是不容易，都是患难姐妹。谁有什么事，我们都是义不容辞地去帮忙。

姐妹情

韩玉芳自称是“西安市的老家政”。1998年，她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家政工作，一直在这个行业打拼至今。

1992年，韩玉芳下岗；接着，丈夫因酒后伤人入狱，留下她和年幼的儿子。拿着前单位每月补助的50元钱，她开始尝试各种营生，直到接触家政。

二十年来，韩玉芳经历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变得好起来。她自称是“最底层的人”，但现在“熬出头啦”。在这段艰难岁月中，西安市家政工工会给予她的帮助和支持，一直深藏在她心中，并早已沉淀为一种浓重而深厚的亲情，一种没齿难忘的感恩。

韩玉芳自言“不太会说话”，她将自己的故事平实道来，却分明让人感觉到了一种生存与温情的力量。

生活所迫做家政

1992年到1998年，我啥都做过，但都没啥起色。我做过小商品生意，逢年过节遇上城管，就好可怜。我们把城管叫“扫荡队”，一看见他们，我们就把放小商品的塑料布四角一提，拔腿就跑。跑得慢有东西就掉了，眼看着过路人把它们捡走。

我跟老公一起下岗，当时很无助，感觉被人家抛弃了似的。下岗后，一点收入都没有，就得自己去外面挣钱。我老公表现不太好，喝了酒跟人打架，戳了别人两刀，进了监狱。

一次，我无意中听原来一个同事说，西安市总工会再就业服务中心要开招聘会。我就跟同事去了。我是1960年出生的，好多岗位都不行，要技术没技术，要文化没文化，最后选择了家政这一行。

那时家政行业刚兴起，我对家政一点都不懂，光知道钟点工。结果我去应聘，中介还看上了我。

为了工作，我借钱买了个二手的BB机。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闲着，但是不干就没饭吃。当时自己啥也不懂，就稀里糊涂到雇主家干活儿。也不知道维权啊什么的，雇主给派啥就干啥，真是勤勤恳恳。

来自姐妹的支持

这么多年做家政，我认识了很多好姐妹。我最感激

的是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张主任和我们工会的姐妹们，她们对我就像亲人似的。刚做家政时，我感觉是去伺候人的，张主任和姐妹们就给我做工作，让我把心态摆正。我碰到难处了，大家就一起帮我。

和西安市家政工工会的姐妹们认识之前，有段时间我很悲观，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就是在这些姐妹的帮助和鼓励下，在物质上和金钱上她们拉我、扶我，我才一步一步走过来。没有我们家政工会，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3年我娃考高中，不巧染了急性甲肝，住院没钱。当时全国正在闹“非典”，我感觉很无助很无助，那种感觉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但姐妹们帮我，借钱给我。虽然因为“非典”大家不能到医院，但她们在电话里鼓励我说：“你的困难就是咱工会的困难，再大的事情，有姐妹们帮你。”

直到孩子出院，一共花了7000多块，把我所有的积蓄和姐妹们借的钱都用完了，只剩200块钱。我跟娃说：“你在家，我给你把饭做好，我要出去打工，家里就剩这200块钱了。”娃挺懂事，就自己在家养病。

我到再就业服务中心，说要上班，中心的老师都知道我家的情况，第一时间给我找到一户。

还有一件我永生难忘的事情。那是在2008年，我离婚净身出户，想住回娘家，可娘家的房门锁着，我问家中的姐妹要钥匙，她们都不知道谁拿着，也许是不敢给我吧。

我同学跟我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既然家中没回应，你就把门撬开住进去。”我听了同学的话，也是实

在没有办法，就把门撬开，可进去一看，屋子里一无所有。

邻居看见我带娃回来，就把自家的一张床板和一个长凳子拿过来，算是给娃安了家。被子是工会姐妹给我的。

有一天，下大雨我和娃睡到凌晨四点，突然听见“咣啷”一声，我家房子的墙倒了。我这人性格开朗，但是没有脑子，当时感觉很无助，不知道该咋办，就坐在窗边哭。虽然我知道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早上七点，我就给家政工会主席和姐妹们打电话，她们马上跑来看，说这房子破旧成这个样子根本住不成。工会姐妹们又各自请假，帮我跑救助，省市两级的都帮我跑了下来，她们也给我捐钱，终于帮我把我家这面墙垒了起来。

进入这个家政行业的人，家庭条件都不好。要补助，就是文明要饭。

我们这些人，走出来真是不容易，都是患难姐妹。谁有什么事，我们都是义不容辞地去帮忙。我们家政工会的领导也挺不容易，自己也在做家政工作挣钱养家，还义务为我们这些姐妹服务。

在工会，你哭啊笑啊，没人嘲笑。当然，姐妹们在一起，有时也会起摩擦，但话说开了就过去了，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

我们工作时的自我保护意识挺强的，我老听姐妹们说有些人遭遇性侵犯啊什么的，我没有遇到过，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性格吧。这时我们大家就交流，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咋办，有时候，宁愿这活儿不做了，也要先保护

好自己。

拖欠工资的情况我也没遇到过，我的姐妹们遇到了，我们都给她出主意。如果确实是雇主有问题，那咱就跳槽。这就跟相对象一样，对眼的咋都行，不对眼就找你的忿（方言，找事）。

至于工资，雇主一般都会跟着市场价格涨。以前双休和单休只差20块钱，现在我们的维权意识挺强，国家法定假日要付双倍工资，其他情况干一天付一天加班费。现在的雇主也遵守时间，单休就是单休，双休就是双休，觉悟和素质都提高了。

熬出头

我做家政，基本上都是一竿子插到底，除非（遇到）雇主家娃上幼儿园或者考大学。我在好几家都做过四年多。现在我干两家，上午九点到中午一点一家，下午四点到八点一家，周六日双休。每天早上，我都把孩子的午饭做好再出门。

前夫没有给过娃抚养费，从监狱出来后老找我。我也给过他机会，但他变本加厉。我性格比较强，受不了他，就带着娃跟他离婚了。

我到雇主家不说是离异，怕人家瞧不起。人家要问我老公在哪儿，我就说下岗了。要是还问，我就说在工地上干活。

在最难的时候，我们那个巷子风气也不太好，我

娃的两个同学都被学校开除了。我怕娃学坏，就带着他出来，脱离了那个环境。那段时间，也是这帮穷姐妹帮我，而我跟自己的亲姐妹那几年都不来往。

我儿子今年27岁，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娃挺聪明，但考了两年都没考上正式职位，现在还是合同工，一个月才拿1800块工资。

我觉得这份工作也好也不好，男娃应该出去闯一闯，就坐办公室跑腿儿打文件，我觉得平台不好。不过那是他的事，我不管。他有他的思想，还是党员，现在把（女）朋友也谈上了。我估计我还能干三年家政，然后就得回家看孙子了。

现在，我跟儿子一起住。我们也买了房，80多平（方）米，马上就到手。我的退休金一直是原来的单位给交。刚退休时我拿926块，现在涨到将近1700块。要不然我咋买房呢？我觉得我缓过劲儿了，而且儿子娶媳妇得有房。

我是按揭买的经济适用房，3600多元一平（方）米，算下来32万，还贷十年。每个月要扣我2200块，我再给姐妹们还点儿钱，也就是说我一个月必须雷打不动有3000块钱的支出。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现在做的这两家，只要雇主不辞退，我就继续干。到我们这个年龄，雇主也挑。毕竟年纪大了，各个器官都有点退化，万一你在人家出啥事儿了咋办？不过我跟他们说放心，我们有医保。

我的身体还可以，跟别人说我55岁了，她们都不相信，都说像四十六七。其实我两鬓都白了，是自己染

的（黑）发。最近我想通了，有时候也花钱去郊游，和姐妹们一起去爬爬山；有痛苦了，就在山里边喊出来，或者互相倾诉，挺幸福的。

哎呀，我现在真的，很好很好。以前我不能说话，一说话先流泪。我就是靠着工会和这些姐妹们的帮助挺了过来。现在我的心情很好，我们这帮姐妹们，基本上都熬出头了。



西安家政工工会组织外出活动

摄影：西安家政工工会

很多家政工的家人都觉得，让她们去干这个工作，是委屈了她们，所以只要回家说在外面受气，家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那就别干了”。但她们又需要这份钱去养家糊口。所以，她们就不愿在家表露，都将苦水自己咽下。

王葳的焦虑

由于现在的家庭负担相对轻松，作为工会现任负责人的王葳能够抽出更多的个人时间来为工会姐妹们服务。此前，她做过几乎所有的家政工种，如今转做家政培训。

一种精神凝聚

原来我和老公都在军工厂上班。2002年待岗，我就开始做家政。陆陆续续做了一年，单位有活儿就去上班，没活儿我就干家政。2003年，我跟我老公一前一后，下了岗。

下岗后，我们肯定得有一个人先上岗，撑起这个家。我老公买了辆出租车，当时要23万，钱不够，我们借了亲戚一些钱，还贷了款，每个月要给银行还2000多元。当时2000多块钱，我觉得挺多的，压力很大。我俩商量，不管挣钱多少，每个月都要把贷款先还上。所以

我也必须出去找份工作。

我到超市看过，也到其他地方看过。但那时孩子小，才上小学五年级，马上面临着升初中，需要给孩子做饭，所以我干的工作最好既能挣钱，又能兼顾家庭。这样，我就选择了家政。

当时，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把早饭、午饭做好，然后去上班。下午我老公回家就可以给孩子做晚饭了。孩子很懂事，从那时起就学会了使用微波炉自己热饭，后来还学会自己做一些简单的饭菜等父母回来一起吃。

这样还算平顺的生活，一晃就是七八年。做饭、保洁、育婴……家政行业里有的工种，王葳基本都尝试过。但她换户并不多，十年里工作过的家庭不超过十家，最长的三户，都是一干就是六七年。

我觉得干家政这一行，首先诚信很重要，其次要抱着吃亏的态度。咱到人家去，又没有像做生意那样背着本钱，不就是自己多出点儿力嘛。咱多干点儿活，雇主自己也知道，只是没有及时地回报你。人家一旦有机会，就会对你有所表示。

在王葳看来，家政工，虽说已被多方呼吁要尊重对待，但在某些时候还是会有受歧视的感觉。

很多家政工的家人都觉得，让她们去干这个工作，是

委屈了她们，所以只要回家说在外面受气，家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那就别干了”。但她们又需要这份钱去养家糊口。所以，她们就不愿在家表露，都将苦水自己咽下。

只有姐妹们在一起时，她们才能说一说，有个宣泄的渠道。来工会，大家说完，一排解，就释然了。有时候大家集体声讨雇主，回去后一个星期，心情会好很多。

家政工会这个圈子，都是穷苦人，离异的、无依无靠的姐妹较多，互助在这里是经常的、必需的，也是自发的。靠钱啊啥的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大，这里靠的就是一种精神凝聚。大家在一起相互鼓励，相互支撑。你能在这个群体中给大家做多少事情，给大家多少帮助和关怀，大家就能认可你。

扶人帮己

下雪天，工会给姐妹们发送“注意安全”的提示短信；逢年过节，给大家发送“祝福”短信；生日，发送“生日快乐”短信。

有很多姐妹工作忙都把自己的生日忘了，一看到短信，才想起来，感觉很温暖，还有工会想着自己。

工会成立，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帮家政姐妹们维权。但凡碰到这样的情况，王葳都尽量亲力亲为。

多事儿的雇主和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雇主都比较好

缠。很多时候，我们还得麻烦信访办和维权中心的老师帮忙一起处理。因为有时雇主家一来一大帮人，那阵势，我也感觉不安全。如果我不亲自去，让其他姐妹去处理，更让我不放心，她们一天不回来，我能揪心揪死。

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无依无靠的单亲姐妹多，若是哪个生病住院，工会便会安排附近区域的姐妹到医院帮忙，谁有时间谁去照顾，顺便送饭。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这些老姐妹组织个互助组。大家的儿女很多都在外地工作，若是以后老了，谁有病了，大家就轮着去伺候，送走一个算一个。大家问，那到最后走的那个咋办？我就开玩笑说，那谁剩到最后谁倒霉，扛着胜利大旗往前走，谁叫你活着死不了呢？

王葳爽朗地笑了，她在姐妹们眼里就是一个直率的人。工会成立十年，王葳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心态好了。

我不知道我把别人调节得咋样，反正自己遇见事就能想开了，慢慢能自我化解。比如有时会觉得，哎呀，我咋这么可怜，但一听她们说，人家那个事情，比咱还苦还倒霉一百倍，就觉得，算了，咱还可以，咱不生气了。

姐妹们遇到烦心事，都愿意跟王葳叨叨。有时，她也会遇到“没法劝”的事。

一次，我听说我们一个家政姐妹，在家把老公打

得满身是青。我还挺同情她老公，以为这男人有啥缺陷呢。结果来了一看，男的又高又胖，女的又矮又瘦。我问男的：“你要忍受不了的话为啥不打她。”男的说：“我舍不得。”我只能说：“舍不得你就回家挨打去。”

其实是这女的在外面老受雇主的气，又不能发泄。她老公也觉得自己老婆累，就非常迁就她，所以她就老回家拿老公撒气。你说你能咋说，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跟男的说“不想离婚你又不想怎么样的话，你就回家挨打去”。

回头我又跟女的单独说了很久：“你别老打你老公，你把老公打坏了，还得给他看病，咱本身经济不好，不是雪上加霜吗？老公不打你，不是打不过你，而是心疼你，回去好好过，实在不行换一家雇主，雇主总是好的多，没素质的总是少数。”

这阵子她不来了，估计和老公和好了。

就算是只有一张桌子，工会也依然能把姐妹们团结在一起。王葳奔走各方，为的只是尽最大努力让大家有个“家”。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姐妹陆续退休，回家照顾孙子辈了。王葳的女儿明年结婚，带外孙的“任务”也越来越近。于是她开始焦虑起来。

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工会又没有办公场地，骨干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摊子事，咱也不能强迫。而且这个接班人，必须不能有一丁点儿私心，唉，我发愁得要死。再后面的事，谁也看不到。

未来成谜

随着整个社会对家政行业的认可与接受，工会的业务内容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最初的维权和心理安慰，过渡到更为职业化的问题。

过去和现在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原来可能只是想说一说，把心中的苦闷排解一下。现在不一样了，新会员更喜欢与从业挂钩的活动，比如法律培训、从业技能交流，等等，跟从业和挣钱没关系的活动，她们就不愿意来。

这样的变化，使得新会员对工会的定位更像是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在情感上对工会认同较少，工会远非老姐妹心中的“家”。

她们更关注工会能给她们什么，她们能从中得到什么。

从这个角度，王葳开始思考如何凝聚会员。最近，她尝试给会员办理互助医疗保障。

我们想办一些切实能让大家受益的实事。例如，免费技能培训、从业技能交流、观摩和参与技能大赛、郊游、从业心理调适、家庭安全知识交流和培训等。互助医疗保障最近还在谈，因为我觉得，能办下来的话会对稳定会员队伍有好处。我们工会的日常运转主要靠会费，每年每人收取30

元会费。收费标准很低，主要是考虑大多数家政工收入不稳定，家庭生活都比较困难，靠家政挣来的钱要养家糊口，不是缺钱不会从事这个职业。现在的钱薄得很，经不起花，以前工会看望住院会员，一次三五十块钱就够了，现在买一箱奶也要60多块钱，看一次会员再少也得100元左右，所以，我们就将看望会员的标准定为不超过100元。

在王葳看来，现在的工会发展到了艰难的瓶颈期。最难的是工会没有生存实体。

最近，我们在给工会申请房子，不然怎么办？如果租房，仅这一项，我们的会费就负担不起。我在看能不能借一间房子，让工会先能安定下来，然后再想办法去发展。

不久前工会开工作会议，王葳把现在工会的处境和面临的问题告诉了大家。

由于没有实体的支撑，我们将会一直面临着靠微薄的会费支撑工会发展的趋势，同时，我们还将面临没有办公场地、骨干流失严重、会员发展困难等重重困难，让我们的工会生存下去，我们就得自己努力，齐心协力，靠我们的力量和志愿者精神，将自己的工会建设好。

在那次工作会议上，姐妹们都表示，愿意一起齐心协力陪伴工会挺过艰难时期。王葳却很冷静。

如果能度过，我们的工会可能就起死回生了；如果不能度过，后面可能会很艰难，也不排除工会自然解体的可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把自己该尽的力量尽到，能给大家做的事做到。如果将来家政工会真的解体了，这也是不可阻挡、大势所趋。

西安市家政工工会委员会成立于2004年9月23日。作为全国第一家家政工工会，当时162名家政服务人员成为第一批会员，其中7名家政服务人员成为家政工工会委员会成员。而今，家政服务人员已逾千人。工会给会员提供技能和法律方面的培训，而对于一些老会员来说，工会就是她们的家，是支撑她们一路走来的力量。



西安家政工工会组织会员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摄影：西安家政工工会

济南篇



因着一条横跨南北的大峪沟和北面颇具规模的小山，大涧沟村由此得名。如今，大峪沟早已枯竭，山间却陆续盖起楼房，供外地或邻近村子的打工者居住。

据山东省情记载，大涧沟村“盛产柿子、苹果、梨、杏、桃。有养鸡厂、石料厂，每逢农历四、九日集”。但因地处丘陵地带，土地少且贫瘠，大涧沟村人均只有一亩多耕地。

为了增加收入，村民们开始养鸡，渐渐将大涧沟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专业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村里开始有人偷偷到济南市区，当起了“保姆”。

大涧沟村具有当下中国乡村的诸多共有特征：随处可见的加盖两三层房屋、并不整洁的公共卫生环境、糟糕的排水系统、午后在广场乘凉聊天晒娃的老人，以及所有这些表象背后那复杂而浓郁的人情世故。

大涧沟村分东、西两村，两个村共有1万余人口。如今，距离第一位家政工走出这里，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村里人陆陆续续外出做钟点工、月嫂、育婴师和老年人护理工，现在，仍在从事家政工作的有2000多人。

据可查询的统计数据，目前大涧沟村80%的村民外出打工，中青年妇女有80%都进入了家政行业，也有部分男性劳动力从事保洁、护工等家政工作。

这也许得益于大涧沟村的地理和交通便利。

在大涧沟的公交站，有九条公交线每天来往穿梭。村子离济南市区很近，随着城市的外扩，两者之间的距离感几近消失。在交通非常不便的21世纪初，村里有妇女偷偷摸摸进城，入户做起了家政。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通往城市的门，彻底

被推开。

“最初那会儿，我们都不敢说是出去做家政，只说出去干活儿。”这是大涧沟村不少大姐总会提到的一句话。彼时，“家政工”这个称谓还没有普及，家政工基本被称作“保姆”。在农村，谁家有人出去做“保姆”，总是有些抬不起头的。

然而就是这份最初“拿不上台面”的工作，却在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摩擦中逐渐成势，一带五，五带十，如不间断的暗涌一般，在大涧沟的东、西二村逐渐推开，并逐渐成为如今村里女性，乃至不少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

随后，家政培训学校进驻大涧沟村，这为村里的家政人员输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

从文化习性出发，村民们并无太多职业规划考虑，即使家政工早已成为村里人可以公开讨论并颇受尊敬的职业，他们更多的还是把这份工作视为或支撑家庭生计，或贴补家用的“零工”。

这既有别于大城市北京的家政工职业化与正规化推进，也有别于中部城市西安的下岗工人将之前的职业感移情到家政行业当中。

支撑这批农家姐妹（兄弟）将这份工作做好的，更多的是人情、互助与良心这些乡土中国温暖的人际关系逻辑，而非一种需要清晰划分责权的职业化主雇关系。

在大涧沟村庞大的家政工群体中，因家庭状况的不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家政这份工作对于每一个人，也有着不同的意味。

对于最早出来做工，现在熬出头的高姓姐妹而言，家政意

味着通往美好新世界的大道；而对于家境窘迫的林大姐和刘大姐而言，家政几乎支撑了整个家庭，成为她们活下去的全部信念。

在济南篇，我们选取了以上四位大涧沟村村民大姐的家庭故事，以及她们的家政故事。她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家境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给她们的安排也不同。

我没文化，不会说得多好听，就是靠诚信，这是第一位的。人要是没诚信，就没意思了。另外，别光认钱，别做表面工作，别有歪心眼儿。

村里最早的家政工

如果高青没有记错，她应该是大涧沟村第一个出来做家政的。

踩着21世纪到来的鼓点，她放弃了村里饭店老板娘的角色，拿着残疾证和家政培训证，跨出了作为城市家政工的第一步。

一晃十五年，因着她的热心肠和多年滚雪球般积累下的人脉，高青开起了家政公司，帮助本村和外村姐妹在济南找生计。同时，她也依然是家政公司的员工，忙着上户下户。

提及家政，这位虽不识字却格外能干的农村大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心态要放正。俺农村的，能上人家里去看看，就挺高兴。”

从老板娘到“保姆”

高青的右眼是假的。在尚不记事的年纪，一次玩耍时，

她不小心用剪子戳了眼睛，落下了残疾。二十多年前，她不做裁缝转开餐馆，也是因为这点毛病。

成为饭店老板娘之前，高青在家做缝纫，一面揽一些量体裁衣的生意，一面照顾年幼的儿子。当时，做一件衬衣只收8角钱。

做裁剪费眼，因此，熬到儿子大些，她就推着三轮车卖起了粉条。接着，开起小餐馆，卖小菜、蒸馒头、炸油条、做菜盒子……“全拿，”她笑言。

高青在村里的好名声也是那时积累起来的。

我卖饭那会儿，有钱没钱照常吃饭，都养成习惯了。老人小孩儿走到我跟前不走，他没钱我也让他把烧饼拿去吃。有时候忙得都忘了结账。忘了结的，就当捐了呗。到最后，大家都来买我的。人品最重要了。

时间就这样跨入了21世纪。家中遭遇经济困难，高青便萌发了出去打工的想法。

我这人脾气不好，想干啥就干啥，不干不行。在家开餐馆，都是脏活累活，我就想出去看看打工是什么样的。现在回想，要是没出去做家政，咱怎么可能上济南？怎么可能上城市人家里看呢？

那个时代，做家政的概念基本等同于伺候人。从老板娘变成保姆，高青也一时不能接受。可是慢慢地，她尝到了这

份工的甜头，最后，索性餐馆生意也就不做了。

家人曾不解地问她：“当老板娘多好，为啥非要给人家打工？”

她答：“没想这个，就是想体验体验。”

时间越短越挣钱

高青的第一份工，是在济南市区一户人家照看一对老人，24小时住家。第一个月的工资是400多元，第二个月加了50元，再到后来涨到了600元。十五年前，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份护理的工作，高青做了不到一年，一直把老太太照顾到去世。

最初做家政时遇到的另一位雇主大姐，让高青至今都会怀着感恩的心去回忆。

那时出来啥也不知道，就觉得自己是保姆。那大姐跟我说：“小高啊，你为我服务，我给你开工资，你给我付出了，就有回报，好好干。”我说：“好，我记住了。”

高青回忆得最多的，都是雇主对自己的好。十年前，有位做服装生意的雇主，还把一件上千元的羊毛绒大衣给她当了奖金。

当时咱不知道那是羊毛绒的，也不知道要放樟脑球保存，第二年让虫咬了。那时候，千把块钱，多值钱

啊。到现在，我和那个雇主一直电话联系，当年我一直把她老娘伺候走。

在高青心里，干家政和别的工作一样。

人家付给咱钱，咱就应该给人家干活儿。你好好干，人家不会看不出来。

十五年间，高青在几十户家庭中做过工，具体数目，她自己也数不清。最紧张的时候，她一天同时干四家钟点工。

再难干的家庭我都干。

即使下户，高青也会先尽力安顿好雇主。

我曾经照顾过一位大爷，现在还有联系，处得就跟亲戚一样。我从他家出来后，给他找了个24小时的（家政工），我没空时还让我老公去伺候他。他相信我，住院拿药都找我，说我比他闺女都强。

时间一长，高青也悟出了家政行业的一些门道。她发现时间越短越挣钱。

24小时干完，干8小时，又干上下午，后来我发现，还不如干一三五、二四六，一个比一个挣钱多，就是跑点儿。

也就是在做家政期间，高青才下定决心，给自己安一只假眼。

雇主家孩子学我，边学边跟他妈说“阿姨的眼是这个样子啊”，他妈让孩子不要这样，说没礼貌。后来因为学我，孩子摔了一下。从那时起我心里就不舒服，后来去做了眼睛（安装义眼）。要没那个事儿，咱做什么眼，之前找对象都没想到，老公不嫌就行了呗。没想到做了眼以后，还更漂亮了。

从“保姆”到老板

作为大涧沟村最早出来做家政的大姐，高青主动或被动地带出来许多同乡。人传人，人帮人，不知不觉间，她帮助不少村民走上了家政这条路。一些同乡开始怂恿她办个中介公司：“你干吧，我们都支持你。”

介绍人家干活儿，人家不好意思，给买东西，我说不要。

这样的情况多了，高青仔细一想，也觉得“反正跟闹着玩似的，那就干干试试吧，毕竟还能当老板”。结果，当初“没当回事”搭起的生意，却在不经意间越做越大。

如今，这个并不足够正规的家政公司已经走过五六年头，拥有几百位服务员。不久前，因为水电暖管道工的到位，高青又增加了项业务。

催乳、婚介，我都做。为什么说我就是闹着玩，公司对服务员没有收费标准，就只收个介绍费。有人说我收费太少了，但我一直都是这个观点：有钱你就多给点儿，没钱就少给点儿。客户那边是100~300元不等，一次性交清，签合同管一年。

一些与她保持联系的前雇主们也会找她帮忙。

不用咱自己宣传，就靠口碑，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不少小区。

做了中介之后，高青越发觉得，既然自己是农村出身，在城市打拼，就更要努力学习，摸索和积累经验。

雇主家有小孩儿的，咱就跟人说个普通话。城里人习惯提前约好时间地点，咱就提前跟人打电话，在村里不这样。进门先换拖鞋，洗了手再抱孩子或者干别的，这是最重要的，我会跟服务员提前说清楚。哎，可有些服务员，就是记不住。

高青公司的“招牌”，是提供“上门服务”，客户们都很喜欢这一点。

相中的服务员试用三天，不行我再领走。有的客户告诉我：“有些家政公司牌子大，我们老年人还得上公

司签合同，有的出租车还不拉老年人，嫌我们上下车麻烦。”我这儿就不用他们这么折腾。

同时，她自己也喜欢上门服务。

最起码上人家里看，我眼饱儿（饱眼福）呗，高兴得不得了。

老板不好当，有时打着吊瓶，高青还得上门调解。

整天调解这个调解那个，服务员出来不容易，用户找个合适的人也不容易。要是客户干脆利索，说“服务员挺好”，这就没事；要是说“服务员，怎么说呢……”我就心里有数了，赶紧说“我再给你找吧”。

事务繁多，不会写字的高青就用1、2、3、4代表不同的事情，靠着记忆力好，努力带着公司运转。

操心多，前一天晚上就得想好第二天跟谁见面，还经常有紧急事情处理。现在习惯了，干这一行就不能嫌烦。

做公司，高青把诚信摆在首位，访谈中她反复提及。

我没文化，不会说得多好听，就是靠诚信，这是

第一位的。人要是没诚信，就没意思了。另外，别光认钱，别做表面工作，别有歪心眼儿。

平衡

别看我是老板，我还是老保姆咧！

做老板的同时，高青依然是其他家政公司的员工。现在，她还在户上照顾一位老人。白天，她处理公司事务，晚上到老太太家做陪护。这份工的工资是每月 2300 元。

我的雇主都不知道我是开家政公司的。我有分寸，不跟别人抢活儿，也不拉别家客户，我公司的生意，都是客户主动来找我的。

每天晚上，卸下老板角色，高青摇身一变，弯下腰给老人洗脚，陪老人聊天。天一亮，她又拿起手机，处理生意。

除了平衡老板和服务员的角色，高青还在努力平衡工作与家庭。

我还看小孙女呢！不是别人想的那样光想赚钱。年龄大了多少干点儿，就是这样。

一提起 2 岁的小孙女，高青就满脸幸福。

我那小孙女，可好玩了。我就喜欢小女孩儿，她正好来到我心坎儿上了。她一出生，我就给她买了两份保险，从现在起就给她存钱，一直存到她结婚。

有了自己眼睛的教训，她对小孙女格外在意。

我小孙女很重要，要是有个闪失，一辈子的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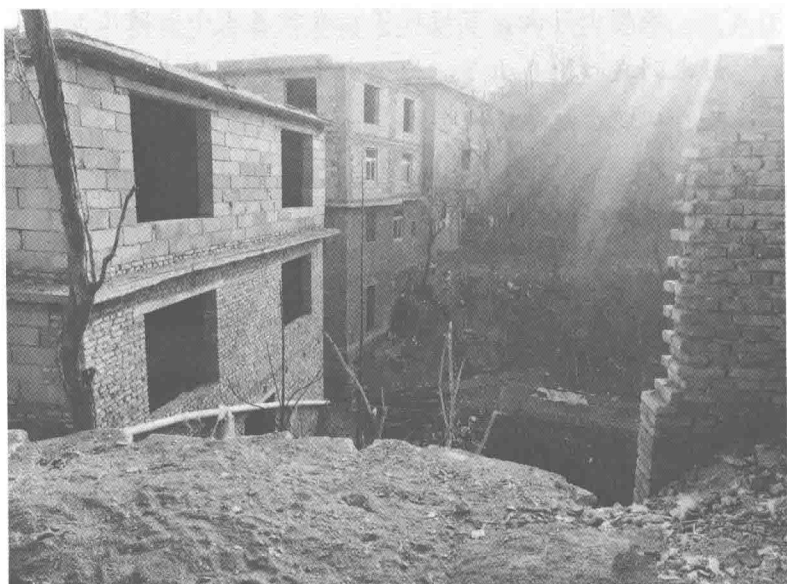
公司这边，涉及文字的工作，高青都交给儿子儿媳打理。她的丈夫、妹妹、妹夫、弟媳和小叔子，都被她陆续带出来做家政。

我没上过学，家里排行老四，两个哥哥都是高中生。我的妹妹现在在家里做饭，同时干着三家，妹夫在单位做饭。老公一个白班一个夜班。我们村都让我带出来了，如今，村里的年轻人里有50%都出来了。

高青现在走到哪里，都会带着自己公司的红色名片。她在济南市区买了房，自言“装修得跟皇宫似的”。

咱也享受享受济南的生活！

只这样，她就觉得足够幸福了。



大涧沟村
摄影：高欣

亏可以吃，但是气不能“吃”。家里的气好“吃”，外面的气不好“吃”。受点委屈不要紧，受气不行。

高大姐的家政工作原则

高青的眼睛受伤时，高云记得自己似乎在场。两人是幼时玩伴，情同姐妹。十二年前，高云开始接触家政，当时，她已经当上了婆婆。

家里钱少，我就出去干半天的活儿，多少挣点儿。

高云乐观得很，说自己天天都高兴，一步三跳，走哪儿都是大家的开心果。她有一双儿女和一对孙子外孙女。儿子得过“济南市十佳公交车司机”的称号，儿媳也开公交车。不久前，女儿也学出了公交车驾驶本。

守着幸福稳定的家庭，高云还是坚持做家政。对于这份工作，她还自己总结出了一些工作原则。

年轻雇主家好干

一九八几年那会儿，我家可困难了。我就买拖拉机搞运输，加砖卖砖，做“砖家”（笑）。运输我做了六七年，中间还盖过房子、修过高速公路。

2003年我才开始干家政。当时我那姊妹高青已经出去了，大家陆续也跟着出去，因为在家收入太少。那时干家政不敢说，怕被笑话。但拿到家政培训证书时，我的心里还是很高兴，跟小孩儿一样。

那时找活儿可难了，找不到活儿的时候直想哭。后来我找到一户，给人家做饭。当时正赶上上班路上修路，我穿的黄球鞋上全是泥巴，走路都拔不出脚来。

在这家做饭，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700元，雇主家的奶奶是天津人，姥姥是胶东人。我在他家都不敢吃饱，怕人说我吃得多，生生把胃饿出毛病来，现在还老痛。开始说在他家干四个小时，可干着干着时间就长了。

那家是龙凤胎，一个孩子一套生活用品，当时刚干，也不知道贴个条（区分），一会儿东西就弄混了。雇主说我，我脸上也觉得不好看。

吃亏不“吃”气

前段时间，我还给新的家政姐妹做过培训。我说咱们吃亏不“吃”气。亏可以吃，但是气不能“吃”。家里的气好“吃”，外面的气不好“吃”。受点委屈不要

紧，受气不行。比如，剩饭不吃他的，他家东西再好，我也不吃；也不能为了挣钱，低级到给人家洗内裤。

我刚开始出去的时候，这些真不知道，啥都不懂。路不知道怎么走，也不知道怎么过马路，有的路口吓得心惊胆寒，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最难忘的是一次在老人家里保洁和做饭，出去晒被子时，我心里想着赶快利索地干完，爬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骨折了，冷汗立马就出来了。我忍着痛晒好被子，又继续为老人洗好衣服，最后实在受不了了，痛得泪滚滚地流下来，汗水和泪水凝在了一块儿。

那一瞬间我就想：为什么做家政那么难？后来我拖着脚去医院，过红绿灯的时候都想爬过去，脚痛，过马路慢，怕车过来。那时就想，在家里该有多好。

曾经有一户，他家有洗衣机也不让我用，我就自己打肥皂洗。他家毛巾用的时间长了，还嫌我擦完的地上有毛毛。我在他家干活儿把脚崴了，在他家贴了片膏药，自己穿个高跟鞋还坚持坐车回家，最后老太太还跟我要膏药钱，工资也没给。最终我还是干不了了。

有时候，累到回家都不想吃饭，雇主还觉得你干不到（位）。很多时候，在回家的车上我没有座位，那时觉得自己真是低等人。

现在我在户上的这家，男主人是证券公司的副总监，人品很好。过春节时还给我买油买大米。刚签合同时月薪是2000，现在涨到了2400元。他的岳父岳母是湖南人，有段时间来住，男主人还特意嘱咐我：“姐姐，

你给我点儿面子，他们事儿多，但就住一个月。”

像这种好人家，我天天愿意去；不好的雇主，我到人家（的路上）上楼时心都咚咚咚地跳。

眼里要有活

我在谁家，开开他家冰箱，面条、水饺、面皮，都有，都是我给他们做的。眼里要有活，不要雇主指一点干一点，要不怕脏不怕累。哪个雇主不喜欢爱干活儿的家政工啊！

我还天天都高兴，人家都说我准有福。上班坐车时我老说：“别管咱挣钱不挣钱，咱天天上济南！”之前还有个雇主老太太对我说：“高儿，你可别走，你来了我年轻了好几岁。”

现在我的孙子9岁，跟着我；外孙女2岁半，就比我在雇主家看的孩子小一个月，跟着她奶奶。儿子、儿媳、闺女都开公交，那是个改造人的地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比劳改队稍微宽松一点，啥赖毛病那里都能治。

最近有份养老院的工作机会，我不想干。这个活儿工资低，而且伺候老人不如带小孩儿，小孩儿可爱。

家政这份工作有委屈，昨晚在服务社（即常驻大涧沟村的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大家编歌，委屈都说出来了。所以孩子得有文化有知识，可现在的孩子都是大学生、独生子女，以后家政这种工作，谁干呀？

三句半

我们家政有话说
说进我们心里话
有啥咱就来说啥
痛快

爱心耐心责任心
爱岗敬业又认真
诚实善良又本份
真棒

不管环境好与恶
本份工作要做好
洒脱一些过得好
无奈

别被比理解要信仁

~~工作~~ ~~分钱~~ 无分界
工作不分富与贱

高高兴兴平安回
(把家还)

~~开心~~
真好

家政工大姐编的三句半

摄影：高欣

干的家数多了，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会忍让，不反驳。人家要是挑三拣四，咱也不会跟人家反抗。人家说你，你就听，因为你拿人家的钱。有些人不好“吃”气，你说他一句也不行。

年轻的单亲妈妈

在数量庞大的大涧沟村家政工群体中，中年女性占据了绝大比例。她们多是家中的女主人，上有老、下有小。有丈夫一起打拼的，家庭经济状况大多好一些，做家政成为“贴补家用”的渠道。然而，如无丈夫撑家，家中女性做家政赚的辛苦钱，便成为全家人维持生存的救命钱。林凤就是这样的一位女主人。

噩耗

2012年，林凤的丈夫酒后骑摩托车，为躲避迎面而来的车辆，连人带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他在医院捡回一条命，胳膊却残疾了。林凤和公婆各自想办法借钱，才将医疗费付清。

然而，丈夫因为无法接受现实，心理压力过大，喝药自杀，留下了35岁的妻子和10岁半的儿子。

我一个人的工资，得照顾公公婆婆、孩子跟我自己。彼时，

林凤已经做了5年家政。

做家政之前，林凤在村里的水泥厂上班，后来工厂倒闭，她被迫出来寻找新出路。

2007年，30岁的她拿着两年前就通过培训拿到的证书，到家政市场上找了份工。

当时家政刚兴起，村里妇女活儿少，又不愿意到商场工作。工作也不再分贫贱了，我就出去干。

随后不久，林凤家中的土地被公家征用。按树补贴费用，一棵树500元。

我家那块地种了50棵果树，你算算，这才一共多少钱？之前还种过杏，种过桃，一年到头也就卖个3000块钱，等于白干。要是碰上当年天（天气）不好，杏还不甜，人家都不要（买）。在家务农不如出去干活儿挣钱多啊。

在大涧沟村，不少村民都因种果树不挣钱而做出外出务工的决定。现在，村里几乎没有了以种地为生的年轻人。

丈夫出事时，林凤的家庭情况还算过得去。

他出事前做保安，有时还能同时上两个班，一个月2800块钱。我上一个班1400块。但他挣的钱基本都自己花了，骑摩托车加油、每天两包烟，再加上自己爱买着吃，2800最后也落不下多少。结果他出了这个事，死了。

丈夫去世后至今，林凤一人带着儿子，靠做家政支撑母子生计，一年忙到头，还是紧紧巴巴。

一是村里人情很重，今天这家生孩子，明天那家孩子结婚；二是咱还带着儿子，儿子也爱买着吃，咱也年轻，平时得买点儿衣裳，最后就剩不下多少钱。

济南的人情

林凤上过的户，几乎都在济南市区。这座以泉闻名的老城，让她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份工，是通过“阳光大姐”家政公司找到的一份照顾老两口的工作。林凤的主要任务是打扫卫生和做午饭，工资每月350元，每天工作四小时，在当时还算不错。

别人都280块钱工资，我是因为离他家远，（价格）才这么高。

在那之后，林凤还做过一户半天的钟点工，每月500元。

这个钱，来回路费都不够，我就骑电动车，单趟需一刻钟。那时马路两旁的树刚栽，连树荫都没有。有时候雇主家电梯还停，我就爬楼梯，一爬爬到十一层。人家都涨钱（工资）了，我才敢提，最后客户才给我涨了25块钱。

为了生计，林凤不得不现实。她说：

雇主人再好，咱出来是为了挣钱。

每次她辞一份工，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根源都是对工资不够满意。

但不能直接说因为不给涨钱。

我还伺候过一个老太太，快90了。老太太对我挺好，但她什么都听她小闺女的。她家离我家太远，我等到同行的工资都500了，才要求给我涨。结果她小闺女说她们楼里谁家找了个300多的。当时我心想，那你找那个300多的去吧，现在都是500了。

林凤曾一周干两家，五个半天，一家一天三小时。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照顾儿子。

干的家数多了，有好的（人家）也有坏的。我会忍让，不反驳。人家要是挑三拣四，咱也不会跟人家反抗。人家说你，你就听，因为你拿人家的钱。有些人（雇主）

不好“吃”气（方言，即受气），你说他一句也不行。

做家政八年，林凤还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一户，从来见不着人（雇主）。下午三个小时，我打扫完、做好饭就走。雇主有什么要求就留纸条给我，“阿姨，你做的炸带鱼挺好”“阿姨，想吃水饺了”……这些都给我写条。她写条说想吃水饺，我就去买馅儿，买东西我给她记账。

林凤从来都是主动请辞，唯一一次被辞退，是因为客户家需要找24小时住家服务员。

当时客户还跟我说不好意思，还多给了我半个月工资。后来他家找的24小时家政工不行，还想让我回去，给我打电话时，我说‘我干着活儿呢’，他一听便没再往下说了。

主雇互助

兜兜转转，最近四年，林凤稳定在一户大姐家做工。

大姐今年40岁，自己开公司，但不常到公司去，除非开会或同事聚餐。其他时间，就是和林凤两个人在家。

买菜做饭搞卫生，我都做。有时她公司有事，也是

我开车跑腿。一周六天，一个月3000，工资还算是高的。

在这户大姐家，林凤最初的工资是2800元。到2013年10月，雇主大姐希望林凤偶尔能够在家陪她过夜，便涨到了3000元。

做这份工的最初，林凤还有其他的选择，但干着干着，她觉得大姐脾气很好；而同时，大姐也觉得林凤来回跑别的客户家太辛苦，两人互相看对了眼，林凤便专心在一户做了。

即使为了支撑家庭而频繁换工，从人情浓厚的乡村走出来的林凤，还是绕不过人情二字。

大姐对我挺好，也放心，还把她的信用卡给我去购物。她知道我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都尽量帮我。她知道我儿子爱吃，就时不时给他买吃的。她也是常年一个人住，我儿子每星期回家两天，有时也跟我去她家。姊妹在一起时间长了，处得有感情了。

休息日，林凤回家打扫卫生，串串亲友，但她从不要求足够的休息时间。

大姐对咱这么好，国庆非有必要歇七天吗？歇个一天两天，咱就回去了。关系这么好，没那么计较。人家平时这么帮咱，咱也不能太认真。人都是相互的，不能说让人家光照顾你，你不照顾人家。而且，不能手贱，人家相信你，钥匙都交给你了，你不能让人家不相信。

儿子与未来

林凤的儿子去年刚入读一家不错的寄宿制初中，这是雇主大姐托人帮的忙。每周五下午，儿子乘小长途车回家，单趟车费3元。

可还没读完一个学期，儿子就嚷嚷着想转校。

那边学校好，严格，又有住宿，交不上不良青年。没想到他还不习惯，还没上完一个学期，就不愿意去了。他是借读生，学习又不行，他还是想跑校。回头还是得找人把他弄回附近学校来。

提到儿子，林凤直言“愁得慌”。

对于自己的未来，她不敢多想。

最近活儿不好找，钱还花得快，所以不涨钱也要干，需要维持着。而且，我40岁的人了，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干的，生意也不会做。就干家政吧，干到人家不用你为止。

养老保险，林凤从没交过，因为每月交600多元“太贵”。

等我老了，就跟现在的许多老人一样，没工作没钱

花，只能指望儿子。到时候，儿子有钱就给我点儿，没钱就自己过苦日子。

这样沉重的句子，林凤说得轻描淡写。



大涧沟村
摄影：高欣

既然命就这样，我认了，就走下去吧。再苦再难我也得坚持下去，小车不倒就推着走呗。除非我真的倒下了，那就没办法了。

家暴人生

与林凤相似，刘红梅以及她的家政工作，也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然而，除了年幼的儿子，刘红梅还需要照顾年迈体弱的老母亲，以及患精神分裂症的丈夫。

刘红梅今年45岁，自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即使每天吃药维持，血糖依然不降。然而比起健康，更让她心惊胆战的是，生怕哪天被丈夫打死。她想过自杀，但为了儿子，还是想再撑一撑，即使未来是那么令人绝望。

精神病丈夫

刘红梅是外村嫁来的媳妇，丈夫是二婚。她本憧憬着能有一段美好的婚姻，怎知一起生活多年，才发现了丈夫的病。

我丈夫一直在家，什么也不干。他神经不大好，需

要住院治疗。去年，医生又要求他住院，但这笔费用我出不起。我自己就挣这些钱，还有老母亲和儿子。

他天天只会抽烟喝酒打老婆，我的头发好多都没有了，都是被他抓掉的。开始不知道他有病，最后才查出他是精神分裂症。他经常出去惹祸，放个火啊，搞个破坏啊，让别人找到家里来说我。

有段时间，他对我的打骂程度很严重，孩子又发脑膜炎，差一点儿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天天哭，压力太大了，太累了。而且嫁过来的媳妇，有些话也不好对旁人讲。要不是那时村里服务社（即前述积成社）的老师开导我，我真就撑不下去了。

我天天都做好了不知道活到哪一天的思想准备。有一年春节期间，一天晚上，我丈夫跟我要100块钱，我没给他。半夜我睡着觉，感觉不对劲，觉得头上黏黏糊糊的。醒来一摸，发现他把一瓶营养快线全部浇我头上了。

有时候，我没招他没惹他，他就抓着我的头打起来。邻居跟我说“要是他打你你就赶快叫人”，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他摁在地上了，起都起不来，怎么喊人呀？

医院一直让他住院，但费用太高，我就让他在家。有一段时间（病情）控制住了，他就睡觉，不出去闯祸；过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毁坏东西、打人。我打过两次110，妇联、民政局都去过。

光是孩子和老人的压力就很重很重了，他还三天两

头打人。有时我真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

他弟弟曾让我给他焊个铁门，我说那他闹得更厉害，而且也不可能天天关里头啊。还有人说你给他戴个铁链子，我说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我也做不出来这种事。

我曾经跟他弟弟说，我养着他可以，但是别打我，晚上他这么给我闹，我白天可怎么干活儿呀。他弟弟说了说他，他能好一些，但过几天又不行了。他控制不住自己，前几天还把客户送我的电视给砸了。

我知道他这个情况，就不理他。他自言自语、骂人，觉得谁都碍他事，他儿子也碍他事。

现在，他倒是不出去惹祸了，这挺好。以前他白天不出门，晚上出去，很危险。我再给他买点药，治疗治疗。我只能维持他不打人这个原则，太多钱我也出不起。

家政所得是我的救命钱

对常人而言，仅家庭暴力这一项就难以承受，何况丈夫还是不具备劳动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家庭的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刘红梅一人身上。

家政工作就是我的救命钱，再苦再累也要承担下来。

刘红梅头一次干家政，是在父亲去世后。

我父亲十一年前肺癌去世，花了10多万，家里钱都花完了。从老家回来，我跟妹妹借了50块钱坐车回济南，第二天就开始干家政了。当时什么都没有，就干24小时住家的。那时我已经结婚了。

第一份工一干就是三年，直到把客户家老人送走。老人的子女素质很高，对刘红梅尊重有加。

住家麻烦点儿，总有这事儿那事儿，很多活要干。老人失眠了，得陪她聊天，她上厕所也要陪着。

之后，刘红梅又照顾过小孩，不住家，一周工作六天，一个月600元工资。

干这一行没有舒服的，各有各的艰辛，我哪个方面（工种）都干过。这两年还能稍微好一点。之前受歧视，出去干活儿，跟亲友都不好说。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不叫“保姆”而叫“家政工”了，这样还好说点儿。

自从有了儿子，刘红梅就不再接住家的工作，改接八小时工。现在，她做着两份钟点工，上下午各半天。

每天早上，她五点半起床给全家做早饭。等母亲和儿子吃完，先送儿子上学，再回家把母亲的午饭准备好，然后去上班。下午下班后，她先去学校接儿子，再安排全家吃晚饭。晚上，等儿子做完作业上床睡觉了，她还要一人打扫家

里的卫生。

这一天的活儿，都得干完呀……

刘红梅现在的客户也是一位母亲。五年前，刘红梅到这家来照顾家中8个月大的女婴。当时，她自己的儿子1岁零7个月。如今，客户家的女儿已经上了幼儿园大班，刘红梅还在。

这家因为很多原因，老人不给她带孩子，最开始是她（雇主）舅妈过来帮忙。时间长了，舅妈要工作，我也熟悉了解了，客户就把孩子和家都交给了我。她舅舅家也不远，相差三四站地，我每周三还要到那边打扫一次。两家的钥匙我都拿着。

如此程度的信任，让她压力颇大，“感觉责任重”。有时候出了门，她还会返回去看看门锁好没有，走到大门口也经常会想煤气关了没、电关了没。时间一长，她感觉自己的脑子都“不太好使”了。

客户了解刘红梅家中的情况，总是鼓励她，尽力帮她渡过难关。刘红梅休息时，客户家的小女儿还会主动打电话来问：“阿姨，你怎么还不来？”

孩子跟我有感情了，离了她妈行，离了我不行。

提到孩子，刘红梅总会开心地笑起来。

儿子

妈妈对小高兴（雇主的孩子）好，刘红梅的儿子一度还吃醋了。

我儿子不高兴，问我：“谁是你的孩子呀？”我说：“都是。妈妈得出去挣钱，要是陪着你，怎么挣钱呀？难道不给你交学费、不吃饭、不买衣服了？”慢慢地，他接受了，还经常给小高兴送礼物，小高兴也把好吃的留给他。

我儿子今年7岁，很懂事，家里情况他都知道。他从来没有自己花过钱，有时还说：“妈妈你怎么浪费呀？挣钱不容易啊。”虽然他爸不好，但我儿子挺聪明，成绩也好。

孩子是我的希望，我真心觉得对不起他。有时候我下班回家晚了，到家看见孩子的脸，明显是他自己哭着睡着的。

之前孩子上幼儿园，能自己走回家，有时候别的家长看见了，帮忙送一下。现在一年级，老师不让学生自己回家。学校三点五十放学，有两次我没有下工，儿子就自己走回家。

去年9月份的一天，下着雨，我下班本来就晚了，电瓶车又没电，扔了不放心推着走不动，可着急了。孩子自己走路回家得20分钟，走到半路雨下大了，他就把衣服脱了盖在书包上。刚好路上有同学认识他，人家家长看他那么可怜，给我送回家去的。

真的，有时候觉得对不住他，但我不干活又不行。老

师一直说要家访，我告诉儿子别让老师来，就说妈妈上班家里没人。老师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怕老师知道家里有个神经病爸爸，对孩子影响不好。毕竟，孩子要在学校上六年学呢。

我儿子现在很排斥这些事，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说同学要是知道了，会笑话他的。现在，他就感觉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而且，他爸还打他。

前段时间，邻居家孩子喊我儿子出去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他就哭得很恐怖，然后我就看见他在前面走着哭，他爸爸跟在后面。儿子背上有十个手指头印，一看就是劈头盖脸打的，后来青了好几天。

为这事，我邻居还要揍他爸爸，说他干吗这样打孩子。我把孩子领回家，也只能搂着孩子哭。孩子受这么大委屈，吵也没法吵。

现在我感觉，儿子的压力比我还要大。一听见爸爸不对劲，他就会对我说：“妈妈，咱赶快跑吧”。

我自己身体不行，可如果我不在了，我儿子怎么办？他还那么小，我放心不下。

不离婚

“妈妈，你怎么不离婚呀？你怎么跟他过呀？”儿子曾这样问刘红梅。

咱要走了，你爸爸谁管呀？他多可怜，要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就没有东西吃，他怎么过呀？

不离婚，是刘红梅思量很久做出的决定。

前几年，我有过离婚的想法，真没法过。现在，站在哪个角度都没法离。离了，我良心上过不去，也对孩子爸爸不放心。毕竟（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了，没有夫妻情也还有亲情在。而且我得对得住孩子，如果我走了，以后孩子大了肯定会想，爸爸有病你不要他，自己走了。

刘红梅的娘家没有儿子，母亲的养老落在她的肩上。一年前，78岁的老母亲做了白内障手术，终于能看清路了。对母亲，刘红梅要求不高，“能半自理就行”。

现在，刘红梅最大的愿望是自己身体健康，然而，即使一直吃药维持，因工作和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血压和血糖还是降不下去。

降压药得一直买着吃，孩子中午吃小饭桌，一个月要240块，平时再加上谁有个头痛脑热的吃点药，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现在我想开了，有时候也自己出去玩玩。周末，我偶尔再跟人干点建筑活儿，一天挣个100块现钱。

对于未来，刘红梅也有自己的小愿望，比如开家小餐馆。

我一直想做家政以外的事，但现在精力达不到，资金就更别提了。创业的钱肯定没有，能维持现状就已经很好了。我做生意肯定能挣钱，但就是命不好。想爬起来呢，又被一棍子打下去了。

她觉得自己只有认命。

既然命就这样，我认了，就走下去吧。再苦再难我也得坚持下去，小车不倒就推着走呗。除非我真的倒下了，那就没办法了。



家政工劳动场景

摄影：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

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

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简称“积成社”，是由9位高校老师以个人身份自愿创建并于2011年8月在槐荫区民政局正式登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济南市第三家民间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积成”二字取自《荀子·劝学篇》中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蕴含“积聚众人力量，成就社会服务”的信念与使命。

积成社秉持“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扎根于城市社区，与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贫弱群体合作，一起致力于帮助贫弱群体改善生计状况、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其立足济南西部、面向全市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积成社组织家政工大姐们外出活动

摄影：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

后 记

时光匆匆，一转眼，距离最初决定做这部口述史的时间，竟已有两年。一年做访谈，一年磨文字，最终以书稿的形式呈现其中的精华部分。

两年间，大姐们的生活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磨文字的这一年，与大姐们疏于联络，不知刘清菊大姐的古筝学得怎样了，也不知刘红梅大姐的身体现在如何。

但我知道，她们就像地丁花，不显眼，却美丽，会开心，也会悲伤。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她们都能顽强生存。这是一股生命的力量。

两年间，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同事也开始与家政行业的人员发生更为广泛的直接联系，如与月嫂、保洁、钟点工、老年陪护、医院护工……

家政行业各式各样的称谓越来越频繁地从大家嘴里吐出，随之而来的有赞扬、挑剔、欢喜、厌恶、尊重、鄙视……在私人领域的互动中，越多依靠，就越多情绪，人的本性显露无遗。对家政从业者与雇主而言，矛盾的处理需要双方的情商与善良。

无可厚非，雇主有善有恶，家政工也有勤勉有懒惰，因此，学会互相尊重，同时给予弱势的一方更多理解，成为极

其重要的一环。更何况，中国社会的服务业正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大潮中急速发展。

如何更好地接受服务，与如何更好地服务，同样重要。

抛开偶见报端的极端案例，家政工群体是一个值得社会关注和尊重的群体。关注是因其日益增长的绝对重要性，尊重在于这些大姐独撑两个甚至更多家庭的勇气和力量。

她们给予社会大发展的支持或许微小，给予每一个家庭的支持却是巨大的。

“没有阿姨，我这个家撑不下去，”一位好友曾对我说。虽然直到阿姨离开她都没有和阿姨达成很顺畅的互动，但她坦承，阿姨已经成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她们之间有感情。

对，是“阿姨”，不再是“保姆”，更不再是那个古老的称谓——佣人。称谓的变化，表明家政工逐步得到认可与尊重。而这，不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吗？

尽管家政行业的立法与规范尚在路上，职业技能培训也仍在摸索中，家政工对市场需求的满足也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然而，只要走在进步的路上，哪怕缓慢，也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这个也许漫长的过程中一滴微小的水。

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他日若为雇主，能从中受益，与家中大姐或阿姨相处得更加开心。

希望接受过我访谈的所有家政大姐幸福、健康、快乐、平安。希望她们言语中的好雇主也同样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最后，感谢本书采写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理解和支持的每一位朋友。乐施会的鲁梅花、北京打工妹之家的阎成梅、北京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的方为芳、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社的田秋菊和李晓楠、西安家政工工会的王葳、北京城边村网站的段慧君以及出版社的各位朋友。

特别鞠躬感谢乐施会林虹及最初将此重任交予我的朋友陈韦帆。

高欣

2015年12月8日于北京



BLOOMING VIOLA PHILIPPICA
The Oral History of Domestic Workers

当家政工人越来越成为城市家庭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股柔韧力量时，家政行业随之成为“朝阳产业”，但家政工人群体仍因带着几分神秘而被猜疑。真正的家政工人，尤其是家政女工，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她们是如何看待家政工作，又是如何以一己之力撑起雇主和自己的两个家庭？在这本口述史中，来自全国三地的家政女工为您讲述自己的故事，揭开家政工的神秘，解开人们的猜疑，呈现真实的家政人生。



出版社官方微信



社会学之思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8918-6



9 787509 789186 >

定价：49.00元